第二篇 開拓

第一章　早期開發史..... 83
第二章　行政區劃沿革..... 136
第三章　各里沿革與地名探索. 140

蘆洲，蘆指蘆葦，洲為水中可居處的沙埔地。顧名思義蘆洲一詞，明確地描述蘆洲此地區在地理上的特色：「位在淡水河上長滿蘆葦可供人居住墾植的沙洲」，這正是清朝年間蘆洲最佳的寫照。

經過歷代先民，葦路藍縷以啟山林，在這淡水河畔的沼澤溼地，闢草萊墾荒埔，此地區的開墾最有資格用「蕃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來形容。

蘆洲人文聚落的開拓成立，是構築在自然環境之上的。在蘆洲這塊環境極不穩定的河濱沙洲上，是屬於「感潮河川」的河段，雖有水源土地之利，亦有洪水海潮之害。

蘆洲人自降臨河洲之初，就展開了不斷與淡水河周旋的悠久歷程，人力雖難以對抗浩浩蕩蕩的洪水沖擊變遷，但是蘆洲人以「螳臂擋車」的精神，「愚公移山」的毅力，在歷經常年失敗而習得的經驗與智慧，成為與環境對抗的重要支柱。蘆洲人對抗災害的方法是順應自然，泉州同安裔的移民，選擇蘆洲做為墾區，就是基於當地的環境與原鄉同安極為相似，其後的農墾工作或水利開發，因應自然而做出改變處處可見，而農墾有成後的聚落位置，也是受水患的逼迫而逐漸退居內陸高地，在蘆洲人的心中，調適自然似乎就是對抗洪水災難最好的方式。

因此，蘆洲的先民、拓墾及老聚落的形成，即是「風生水養」，依附於淡水河畔，依附貼近觀音山下的平原土地，一步步循序漸進發展而成的。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與堅毅卓絕的拓墾精神，長期的交融互動之下，蘆洲人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套「與水共生」的生活型態，形塑蘆洲地區獨有的區域性格。

從蘆洲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到洪水潮害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其中特別是淡水河的水患，從深層刻劃著蘆洲人的生活型態，引導蘆洲人必須不斷作出調整與改變，來適應水患頻仍的環境。蘆洲人並非試圖去挑戰或對抗自然環境，而是以順應、調適或趨避的方式來面對自然，因而逐漸發展出「依水而生」的生活型態，以求取在這塊土地上安家落戶的終極目的。

蘆洲現在是臺北大都市圈內的一個很有特色的繁榮市鎮，但是在三百多年前，這裏還是水澤彌漫，蘆草叢生。除了那些以漁獵主的平埔族人，時而在這一帶活動之外，更多的是停棲著無憂無慮的鷺鷥和水鴨。清代中期以來，福建沿海的漢移民一批一批地來到了這塊尚未開發的土地，篳路藍縷，辛勤耕作，逐漸把這片水澤之地開發成臺北的魚米之鄉。

因此，蘆洲境內一切的人文景觀，處處可以找尋到先民與水搏鬥、與水共生、用水維生的拓墾痕跡，此即蘆洲人在惡劣拓墾環境的磨練與考驗下，所創造出來屬於堅韌不屈的性格，也是如此「番薯不怕

落土爛」的性格，讓蘆洲由沼澤變田園；由貧窮艱困而富裕安康；由溼地沙洲轉變為「賓士之鄉」。

第一章
早期開發史

自清康熙中葉以來，先民由唐山過臺灣，尋找開墾拓荒的新地區，在乾隆中葉更由於清代三朝盛世，人口大量倍增，在山多田少的閩粵兩省，土地無法負荷暴增的人口壓力，因而形成向外推力的海外移民潮。鄰近中國大陸的臺灣島，特別是尚未開發飽和的臺灣北部，變成了移民者的理想地點。位於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因為可以停泊船隻，所以成為先民開發的第一站。隨著移民人潮的湧入，便從八里坌沿著觀音山山麓開墾，漸而轉移到和尚洲，因此在臺北盆地的開發史上，蘆洲擁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第一節　自然環境概況

一、平原地勢的低平

臺北盆地是淡水河流域的集水區，而且成為一向下游集中的樹枝狀水系，各條大小支流集中匯流於主流淡水河河道，在

盆地西北角落關渡—獅子頭隘口附近，與大支流基隆河匯流完成後，由淡水與八里間注入臺灣海峽。

淡水河的流域面積約 2,726 平方公里，主支流遍佈盆地邊緣山脈盆底平原，主流長 160 公里，流長及流域面積皆居全島第 3 位，由古至今皆為臺北地區的水源及經濟動脈，臺北地區的發展與之緊密相依。[1] 淡水河的主要支流有三，即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而關渡的對岸另有一小支流塭子川來會，淡水河主流及塭子川所包夾的區域就是蘆洲所在的位置。

蘆洲的地形平坦，為淡水河主流及其支流塭子川所共同沖積而成之沙洲，是一個典型的氾濫平原。[2] 塭子川，主流長 9 公里，流域面積為 108.2 平方公里。塭子川發源於林口臺地，河源高海拔 28 公尺，貫流於臺地東側崖坡下側與盆底平原之接觸帶，匯集林口臺地東斜坡及三重、蘆洲一帶盆底平原諸水而成，[3] 這些塭子川的支流主要有五股的大窠坑溪、冷水坑溪、觀音坑溪及蘆洲方面的洲子尾溝、水湳溝等。[4] 塭子川由西南流向東北，於五股獅子頭注入淡水河，河床坡降極為平緩，為淡水河下游左岸蘆洲平原地區唯一的支流。

由於位於山區的上游比降大，流速高，於是洪水來臨時，即自山區迅速流洩至中下游的盆底地帶，而中下游的比降小，洪水一突破山口，即流速大減，同時諸河匯集於盆底，洪水自然宣洩不暢；再加上洪水沖刷上游脆弱的地層，挾帶大量土石下灌，一旦進入臺北盆地，流速因河床比降突然變小而迅速減慢，使得流水無力攜帶大量土石，於是造成泥沙大量沉積於盆底，河床也因而淤高，河水只能往兩岸平原傾洩。[5] 由此可知，淡水河系這種上下游高度的巨幅落差，所換來的就是洪

---

[1]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11。

[2] 當洪水氾濫時，河水越過平常的河道，向兩岸低窪地溢流，凡被河水氾濫所及的地區，稱之為「氾濫平原」（flood plain）。氾濫平原依成因可分為：1. 侵蝕氾濫平原，係由於河流側蝕谷壁而成者，通常只覆一薄薄的堆積層。2. 堆積氾濫平原，是一般人所指的氾濫平原，其谷床由厚厚的堆積物所成。氾濫平原上，由於河流的氾濫或河道的移動常造成一些小地形，如自然堤、牛軛湖、沼澤等。一般的堆積氾濫平原，可謂一種沖積平原，常成耕地，而有人工堤圍護。洪水時常因氾濫發生水災。臺灣島上的溪流氾濫平原特別發達，高屏溪及淡水河下游頗具典型。蘆洲即為淡水河下游的堆積氾濫平原。參見石再添，《地形學講義》（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71），頁 71。王鑫，《地形學》，頁 17。

[3] 陳三井總纂，《臺北市發展史 • 第二冊》（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06），頁 353。

[4] 楊萬全，〈臺北盆地零公尺地區的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報告》6（1980.06），頁 47。

水速度的加劇及災後大量土石的沉積。

在日積月累之下，淡水河下游地帶沙洲遍佈，蘆洲這個大沙洲的形成即得便於此種堆積作用。然而，沙州過多及面積過大窄化了河道的幅度，阻礙了洪水的流洩，進而壅高水位，這都會讓水災更加嚴重，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蘆洲平原此區域低平如履的地形，以及淡水河的沖積土含有有機肥，雖然十分有利於居住及農業灌溉施肥的發展，但盆底之地有如大鍋之底部，周圍有發源於盆地周圍各山區河川水流環繞匯聚於此，北邊又有每月農曆朔望之時，海水大潮水漲滿潮來襲。

當風雨會集之時，山水宣洩潮汐共漲，上下夾攻低窪的蘆洲地區，於是就成為眾水淵藪盤踞之地，千百年來此地先住民，不分族群深受水災的困擾。水災的迫害得便於蘆洲低平的地形，且地質、氣候、水文、土壤及生物等自然要素亦深受地形的影響，所以地形實為探討蘆洲天然環境的首要之務。[6]

淡水河下游沿岸位於臺北盆地的盆底地區，[7]而蘆洲又為此盆底地區的最低點，全境海拔高度在 2.5 公尺之下、相對高度不及 1.5 公尺，平均坡度僅 0.05%，[8]為一低窪平坦的沖積平原及河岸沙洲地帶，可稱為臺北盆地的「盆地之底」。[9]因為蘆洲地區是「康熙臺北大湖」，最後離開水底的湖積平原，與附近的五股、社子都是低窪地區。

二、康熙臺北大湖的規模

關於康熙臺北湖的存在與否，是歷史及地理學界長年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大多數學者是肯定此湖存在的，但對其面積大小及形成的原因，仍有爭議。

根據郁永河在康熙 36 年（1697）丁丑春，曾採硫磺於臺灣之雞籠淡水，寫下《裨海紀遊》的著作中，曾提到當時臺北盆地情形：

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

---

[5] 董羽，〈臺北盆地水災因素之分析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05），頁 12-14。

[6] 地形與由大氣、水、土地、生物等所構成的生態體系中的每個環境因子間，有著密不可分的生態關係，並且地形在規模上比較廣大，因此地形是為各個環境因子交互發展的基礎。參見王鑫，《地形學》（臺北：聯經，1991.10），「序」。

[7] 此處所謂的「盆底地區」是指臺北盆地中海拔七公尺以下的區域，面積約一百八十平方公里。這個區域為可能遭受淡水河之洪水災害的潛在地區。董羽，〈臺北盆地水災因素之分析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05），頁 117。

[8] 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蘆洲鄉志》（臺北縣蘆洲鄉：蘆洲鄉公所，1996），頁 4。

[9]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臺北縣蘆洲：博揚文化，2005），頁 33。

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余為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為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為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不綴；覓之累日，不可得見。

陳正祥在《臺灣地誌》中即引述這段史料，並認為此湖為一鹹水湖，湖岸與今日 10 公尺等高線相符，而湖水淹沒了盆地的西北部，大湖面積推估應有 150 平方公里。但林朝棨則以臺北盆地一直存在著由東南向西北傾斜的運動，及臺北盆地的地變量不能代表全臺灣地變量的理由，認定當時的等高線並不等同於今日的等高線，進而懷疑陳氏湖面為今日等高線 10 公尺的說法。陳林兩氏對於湖畔等高線的說法雖有歧異，但都肯定大湖的存在及其由大地震陷落而成的成因。

另一方面，對於康熙臺北大湖的存在持較為否定的態度者為翁佳音，他在《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一書中提到，根據陳林兩氏的推論，今日的萬華東園地區是在所謂的「康熙臺北湖」之中，但清代史料中已證實康熙 47 年（1708）前後已有人於萬華東園地區開墾成田，那麼等到湖水退出盆地，且鹹化後的土地改良為可耕地，在從郁永河見到大湖的康熙 36 年（1697），到墾田成地的康熙 47 年（1708）這僅僅 10 年間完成，是件不可能的事，因此他認為陳林兩氏誤讀史料，並進一步推斷，郁永河所描述之突然陷入水中的一片土地，僅是指文中所稱「麻少翁等三社」原所在地的社子島一帶而已。

針對翁氏這個說法，鄧國雄在一篇書評中提出反駁，認為今日關渡、社子、蘆洲及三重一帶地勢本就低窪，平時水域相當廣闊，一但地層下陷，其水域自然大增，所以大湖湖域當不僅只有社子一帶之地，而且大湖並不一定是鹹水湖，加上地勢隆升及河川沖積造成湖面退縮時，沖積土的覆蓋亦可免除鹽漬土壤的洗鹽困擾。

然而，鄧氏的說法並未解決為何翁氏所提出之，何以康熙臺北大湖會如此快速的淤積成陸的疑問，比對萬華東園地區的地理位置及大湖範圍後，萬華東園應位於大湖之畔，是以其部分土地本為陸地，在湖域中之部分亦可先期露出及優先得到河川的沖積，淤積成陸的速度當比他地為快，有人在此開墾並不足為奇。[10]

此外，近年來對於康熙臺北湖的研究，有林明聖等人利用歷史資料中的墾耕紀錄及科學研究中關於地殼上升速率、沉積速率、地震規模及斷層活動等資料之綜合比對，重新考證大湖的面積及成因。認為大湖面積並無過去研究之大，且並非鹹水湖，可能只包括西從成子寮經關渡，北至紗帽山西南麓，向東南到士林的基隆河沿岸，南至現今大龍峒以北，再向西過蘆洲連接成子寮，面積約 90 平方公里。相當於今日關渡平原及塭子川沼澤地區 3 公尺等高線以下的封閉區域；而在成因方面，林明聖等人認為康熙臺北湖並非地震山崩所造成的堰塞湖，應是地震後土壤液化所產生的湖泊。[11]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康熙臺北湖存在的可能性相當大，而其成因與地震脫離不了關係，至於範圍則仍有爭議，但無論是翁氏或林明聖等人的說法，鄰近社子島的蘆洲地區在康熙 33 年（1694）後沉入湖底的可能性極高。

我們由《裨海紀遊》的敘述，在語句中描述有「千尋瀑流，在晝夜轟耳」。這是符合地形演變的描述，因為在地層陷落後，必有崩崖面形成，這在地形學上所謂的「遷急點」，是最易造成瀑布群和急流河段的地區。

然而郁永河在文章後文中，對自己所描述的壯觀氣勢，在踏查自己住處後山的硫黃穴後才發現自言：「吾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綴者，是硫穴沸聲也」這是標準的火山地形景觀，至今小油坑風光依舊仍有此沸聲巨響。而且當時的古地圖中，未有斷層崩塌崖，也並未發現「遷急點」所造成瀑布群和急流河段，所以筆者認為「康熙臺北湖」的形成，並非地震斷層造成，只是因為地震搖晃，造成土壤液化地層下陷，這對臺北盆地底原本就是較為鬆散的湖積平原，遍布沙洲沼澤又是低於海平面的「感潮河川」[12] 地區，是很合理的推論。

近來也有學者謝英宗經由科學推論，嘗試著要將其深度與大小規模還原出來。當時的船舶大小，郁氏並未交代清楚，以

---

[10]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4），頁 24 注 17。

[11]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 地理類 ・ 第 9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23。陳正祥，《臺灣地誌（下）》（臺北：南天，1994.10），頁 1013-1014。林朝棨，〈臺北盆地之地形發達史〉，頁 642-643。芮逸夫等，〈「從考古學人類學看臺北盆地」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第 5 期（1963.12），頁 113-115。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06），頁 44-46。鄧國雄，〈《大臺北古地圖考釋》書評〉，《北縣文化》58（1998.10），頁 35。林明聖等，〈康熙臺北大湖考釋〉，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編，《第三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9.05），頁 125-146。

當時使用之中型海舶來估計，吃水深度約在 1.9 到 3.6 公尺之間。又為了不碰觸到水面下，3 年前地震半倒的平埔族屋舍而擱淺，兩者相加約 4 到 5 公尺，[13] 這樣的深度很符合郁氏所見：「**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

郁永河他當時所見到的湖上風光，只見竹梢卻不見平埔族屋舍，一般來說刺竹叢高度約 6 到 10 尺左右，[14] 所以湖水 5 公尺深度剛好見竹不見屋。但這並不是 1694 年地震的地陷落差，因為郁氏是在農曆 5 月初二日進入臺北盆地正值北臺灣的雨季水位高漲，初二也正值大潮。淡水河口的潮差觀察紀錄（1998），淡水河口平均潮差約為 2.2 公尺，朔望日最大潮差可達 3.3 公尺，以當時的船舶並無機械動力系統，因此利用漲潮時的潮汐進入臺北盆地可能性相當大，直到今日獨木舟划船運動者，也是利用潮汐漲潮時溯河而上。

換言之，郁氏進入臺北盆地之時，正是最大潮差日的漲潮時分雨季湖水高漲，兩個因素壅高湖水位才有 4 到 5 公尺。扣掉 2 到 3 公尺潮差水深，真正因為地震地陷所造成的落差可能不到 3 公尺。以 3 公尺左右地陷落差合理估計量，包含今日基隆河下游的 3 個番社所在區域，社子島、淡水河蘆洲—社子島段的河道和關渡平原的一部分，面積約 30 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臺北盆地的地形面非常平坦，又深受潮汐的影響，雖然高低潮之潮差水位垂直落差只有 2 到 3 公尺，但是水平方向距離所涵蓋的面積差異相當可觀，因此康熙臺北湖在滿潮和乾潮時雨季與乾季的水域面積，相差非常巨大不易正確估計，面積約 30 平方公里左右只是參考值。[15]

由以上謝英宗結論更可以證明筆者前文推論，「康熙臺北湖」的形成，並非地震斷層造成，只是因為地震搖晃，造成土壤液化地層下陷所致。事實上，以郁氏農曆 5 月初二入臺北盆地，正值農曆大潮潮差水位最大來看，至少應扣掉 3 公尺的潮差水位，再加上雨季山區洪水匯入壅高水

---

[12] 淡水河感潮河段，若以水位具週期性變化而言，1989 年的感潮範圍約為淡水河主流至板橋浮洲鐵路橋及對岸的新莊，新店溪至中和的秀朗橋，基隆河則到汐止的江北橋。若以海水入侵而言，則小於前述水位變化的感潮範圍，大致為淡水河主流可至板橋浮洲鐵路橋及對岸的新莊，新店溪在華江橋至中正橋之間，基隆河則不超過內湖橋。參見張瑞津、石再添，〈淡水河下游感潮的研究〉，《地理學研究》13（1989.12），頁 6。董羽，〈臺北盆地水災因素之分析研究〉，頁 33。

[13] 謝英宗，〈康熙台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地理學報》27 期（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印行，2000.6），頁 91。

[14] 淡水河畔之社子國小，校園停車棚旁曾有當初徵收宋氏祖厝所留刺竹叢，一成熟的竹叢大約三層教室高約 10 公尺高。

[15] 謝英宗，〈康熙台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地理學報》27 期，頁 91。

位，陷落量應該不到 2 公尺，但其面積規模應更大，不只如謝氏所言，只限於基隆河下游社子島一帶，淡水河左岸地區今日三重、五股、蘆洲一帶，新店溪與大漢溪會流處與河道周邊的溪埔沙洲地，應該都陷落不少，只是郁永河少去或未到這些地區，因而無在文中提及。

三、河道曲流的發展

清代《淡水廳志》在描述臺北盆地內，基隆河的形勢時，附帶提到了蘆洲的地形：

> 大隆同溪（基隆河），其源自暖暖、三爪仔。至保長坑，水勢微急，經峰仔峙下瀨有聲。其西南曰水返腳，復繞錫口轉至劍潭。又西南經大隆同至番仔溝，會擺接溪（大漢溪）、新莊溪（大漢溪）、艋舺溪（新店溪），經關渡入港。大隆同外有和尚洲平闊。[16]

從淡水河右岸大隆同（今臺北市大同區）隔河眺望，可以清楚的看見一大片低平廣闊的河濱沙洲平原。外地人能輕易如是觀察到此地地形，當地住民對於這片土地的平原地形地貌，當然更有鮮明深刻的體驗與感受，從而反映在蘆洲的種種地名之上，我們留待後文詳述。

除了沙洲遍佈之外，自由曲流的發達亦為淡水河下游的特徵之一，尤其是由新莊經三重、蘆洲，一直延展到五股這段河道上的大曲流帶。因河流受地面傾斜程度，岩層軟硬不同等因素影響，河道常呈彎曲。

在河道彎曲處，兩岸水流能量不一，一側因水流較急，侵蝕力較強，致使河道不斷後退，形成凹岸，另一側則因水流較緩，堆積較盛，致使河床平淺，形成凸岸，而在淡水河下游河段，蘆洲南緣的河濱區域，正位於淡水河大曲流帶凸岸的頂端部分，堆積作用特盛。[17]

淡水河由上游攜帶而下的泥沙流到蘆洲曲流地帶，東岸為社子島，屬於受水流侵蝕的凹岸，河水較深，河岸基礎被水流所攻擊，河階面土石易於崩塌，隨急流沖失，河岸因而逐漸後縮；而西岸蘆洲則為堆積面的凸岸，流速較慢，河水甚淺，泥沙易於快速沉澱而堆放起來，河岸不但少有流失，反而會不斷的淤積新生沙地，於是河岸漸往河道中前進。[18]

位於大曲流帶凸岸的新莊頭前埔、二重埔、三重埔及蘆洲，此一月牙形地帶皆為受到淡水河的曲流沉積作用，淤積而成

---

[16]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36。溪名古今之對照詳見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1996.12），頁 22。

[17]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53。

[18] 參見鄒豹君，《小地形學》，頁 91。洪英聖，《臺北縣地名探索》（臺北：時報文化，2004），頁 138。

的沙洲地。這道淡水河下游的「肥沃月彎」，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適於耕作，然其沿岸多為鬆軟的淤泥地，水域過淺，難建大型碼頭，航運的發展空間因而不如港闊水深的新莊，以及位居凹岸地帶，在淡水河對岸的艋舺、大稻埕等河港聚落。[19]

這一個大曲流，日後也決定了清朝臺北盆地發展的商業核心之轉移，以及日後淡水河兩岸的命運。原本是政治商業中心的新莊，因為泥沙的淤積，競爭不過日漸開發的淡水河右岸平原，而且又有港闊水深的艋舺碼頭河港，因此拱手讓出政商中心的首要地位，加上日後大稻埕成為世界級貿易口岸的發展，更確定淡水河右岸是港口核心的商業市區中心，左岸只是供應物資的農業腹地；左岸為「臺北縣」，右岸為「臺北市」，在三百多年前「康熙臺北大湖」消退，淡水河形成此一曲流河道，就已經決定了。

四、感潮河川的影響

臺灣的河川大多坡陡水急，很少受潮汐影響，惟獨淡水河下游流貫臺北盆地的盆底地帶，河床平緩，流域距離海口又近，因此感潮現象特別顯著。[20] 河川的感潮最易從水位及鹽分的變化觀察出來，以民國 78 年（1989）8 月 19 日的淡水河為例，當大潮來臨的時刻，與漲潮前的水位相較之後的水位差，有逐漸向上游遞減的現象，如淡水渡口的水位差為 301 公分，關渡橋為 292 公分，但潮流到了臺北橋之後，因位於大曲流帶的頂端，流速較慢，河水與潮水於是在此壅塞，兩股不同方向的水流相擠之下，水位差因而提升至 305 公分，超過了河口及關渡橋，而這種潮汐與曲流地形複合作用的結果，經常阻礙了洪水排洩的流路，造成此段河面的水位顯著提高，使得附近的三重、蘆洲地區陷入嚴重水患之中。[21]

在河水鹽分的變化方面，民國 78 年（1989）7 月 20 日大潮時，淡水渡口及關渡的河水電導度均具有高度的鹽份，遠超過高鹽河水的標準，顯示漲潮時淡水河下游的河水極鹹。[22] 而當大潮及颱風同時來臨之際，高鹽分海水常夾雜著河水，溯感潮河川的水道倒灌至內地，被淹及的土地受到嚴重的鹹化而形成大片荒灘地，如民國 57 年（1968），艾琳、艾爾西兩次颱風接連引發海水倒灌，蘆洲的西部一帶受海水所淹而成汪洋一片，海水退去後，農作枯死，農地成為高鹽分的荒灘，廢耕的土地面積廣達兩百公頃。[23]

---

[19] 楊蓮福等編，《三重埔風情畫》（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埔文史學會，2003.01），頁 19。

[20] 鄧天德，〈臺北盆地洪患地理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06），頁 60。

[21] 張瑞津、石再添，〈淡水河下游感潮的研究〉，《地理學研究》13 期，頁 9。

[22] 張瑞津、石再添，〈淡水河下游感潮的研究〉，頁 16。

此外，潮流的上溯亦減低了淡水河的流速，使河水的搬運能力降低，於是沉積加強，而漲潮時海水也會將海外或河口的漂沙湧入河道，造成沙洲的堆積，因此，淡水河中沙洲的存在實為潮水及河水聯合作用的成果。[24]

鄧天德將臺北盆地的洪患類型分為 3 種，分別為海潮洪水共氾型、洪水氾濫型及積水氾濫型。蘆洲、五股及社子地區的水災屬於第 1 類：「海潮洪水共氾型」，當颱風來臨、河口起大風、暴雨期間及石門水庫洩洪這四種狀況發生，又剛好遇到海潮上漲時，加上關渡峽口的地形拱托作用，海水即會倒灌，聯合洪流淹沒五股、蘆洲及社子之地。

而狹窄的河道地形與潮水的交集也會造成洪水位的提升，促使水災嚴重化，如關渡及對岸的獅子頭共同夾峙成淡水河下游的一個峽口地帶，當洪水下衝至此，適逢潮水上漲，兩者的高水位相遇勢必造成另一波更高的水位，洪水及潮水為求宣洩，只能相互混雜，共同氾濫河道兩岸之地，此即蘆洲、五股及對岸的社子島被列為「海潮洪水共氾」之區的主因之一。[25]

第二節　史前文化與平埔族

一、相關的史前文化

約莫 7,000 年前開始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出現了大坌坑文化，此文化為南島語系民族的祖先型文化，代表著北部地區農業初起的階段。臺北盆地的大坌坑文化遺址主要分布於今日的五股、關渡及圓山之間的湖畔山麓地帶，此時的蘆洲仍在湖底，位於大坌坑人活動所不及之處。[26]

在大坌坑文化的晚期，可能因稻作的傳入，逐漸演變為新石器中期階段的訊塘埔文化，此文化的年代約為距今 4,500 年至 3,500 年之間，分布於北海岸、關渡以下的淡水河岸，以及臺北盆地北側緩坡一帶，以細繩紋陶的製作為其特色。[27]

在訊塘埔文化之後，因松山期臺北鹹水湖在距今四千多年前逐漸淤積，湖畔漸漸的沼澤化及陸地化，湖水集中於盆地西北部，湖畔出露了大片的陸地，臺北的史前人類因而得到較為廣闊的生活空間，於

---

[23] 陳憲明，〈台北市近郊蘆洲鄉之土地利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06），頁 43。

[24] 董羽，〈臺北盆地水災因素之分析研究〉，頁 37。王鑫，《地形學》，頁 192。

[25] 鄧天德，〈臺北盆地洪患地理之研究〉，頁 119-123。

[26] 吳健蘭，〈大臺北地區原住民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2002.06），頁 36。

[27]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09），頁 31。

是 3,600 年到 3,400 年前左右，盆底的東北部地區發展出新的文化類型，此即芝山岩文化。

芝山岩文化擁有精美的陶器、石製農工用具，以及現漁獵用的骨角器，並在遺址中發現大量炭化的稻穀，顯見此時的臺北人從事著稻作經營，兼以漁獵維生。繼芝山岩文化之後，臺北盆地北側一帶出現了以貝塚為特徵的圓山文化，存在的時間約在 3,500 年到 2,500 年前之間，遺址分布於淡水河兩岸及新店溪下游的河階地，由食用後的貝殼、獸骨、魚骨及陶、石、骨角器所堆置而成的貝塚之出現，為此文化的一大特色。[28]

值得注意的是，臺北盆地發現的各個遺址中，於日治時期的蘆洲南港子地區，也發現了一個貝塚遺跡－南港子遺址。[29] 從其擁有貝塚的特徵，以及分布於淡水河下游一帶來看，可以推測此遺址屬於圓山文化的類型，但這個遺址的發現者與詳細位置皆不明，且此時正是「圓山貝塚期臺北湖」水漫盆底的時期，蘆洲是否有史前人類活動的可能，尚屬可疑。

圓山文化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而在晚期的淡水河西岸平原一帶，則出現了一群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的住民，這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臺北盆地的代表文化－植物園文化。植物園文化大致上從距今 3,000 年前開始，在 1,800 年前結束，此時的臺北盆地已經完全陸化，提供了廣大的平野供史前人類充分利用，促使盆地的人群逐漸複雜化，文化因而快速的發展與變遷。[30]

經過了長時間的石器時代發展孕育，距今約 1,800 年之前，臺灣北部的人類歷史，終於更進一步的邁入金屬器時代：廣泛分布於淡水河口及臺北盆地西北部的十三行文化，可謂是為此期之代表的史前文化的族群。

十三行文化為臺灣金屬器時代中，各個史前文化中，唯一具備煉鐵技術者，這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突破，也是臺灣史前文化劃時代的進步，可畏一重大的里程碑。在十三行遺址中發現了煉鐵製程的遺跡，以及大量鐵渣的遺留，而其他同時代的史前文化，目前都只有發現金屬器的使用而已。[31] 這種製鐵的技術可能是從外地，經由海運傳入至淡水河口地區，其後再逐漸沿著淡水河的水運路線，朝向東方及南方擴散到臺北盆地內和北海岸一帶。[32]

位於淡水河畔的蘆洲地區，在十三行

[28] 劉益昌，《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博物館，2002.05），頁 78-88。
[29] 林興仁主修、盛清沂總纂，《臺北縣志》（臺北：成文，1983（1959-1960）），頁 1050。
[30] 劉益昌，《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頁 97-106。
[31] 劉益昌，《臺灣原住民史 ・ 史前篇》（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12），頁 50。

文化的早期和中期（1800~600B.P.），土地受到「西新庄子貝塚期臺北湖」的覆蓋，至今未有史前聚落的發現，到了晚期（600~400B.P.），由於陸地抬升、湖水退卻，在今北投一帶的盆底平原，出現了社子、田心子及土地公埔等史前聚落的遺址，顯示十三行文化晚期，臺北盆地的地形環境應與今日相近，但對岸的五股及蘆洲等低窪地區，因並未有遺址出土，推測當地應仍存在著小範圍未退的積水。[33]

在時間的延續上，十三行文化可從距今 1,800 年前，延伸至 400 年前的 17 世紀，前後約 1,500 年的時間，而十三行文化最晚期的階段為北海岸的舊社類型，以及淡水河口的長坑舊社類型。

這兩種文化類型皆起始於 500 年前左右，經由考古遺址的考證，這兩種文化可能分別是馬賽人及八里坌人的祖型文化，外再從 16、17 世紀的西班牙及荷蘭文獻中透露之訊息，可以約略的把史前人類，與稍後活躍於臺北地區的凱達格蘭族，作出文化上的連結，並由此將史前時代的下限。

分布於北海岸地區的馬賽人和淡水河口八里坌人，是屬於平埔族凱達格蘭系統的人群，他們都可將族系的來源推至 1,800 年前的十三行文化早期，甚或距今 2,500 年前的植物園文化時期，顯示史前人類與平埔族，在文化及血緣上有著一定的關連。銜接上凱達格蘭族出現的時間，展現北臺原住族群歷史的延續性。[34]

二、文獻中的平埔族

（一）惡劣的生態環境

蘆洲現在是臺北大都市圈內的一個很有特色的繁榮市鎮，但是在三百多年前這裡還是水澤彌漫，蘆草叢生。除了那些以漁獵主的平埔族人時而在這一帶活動之外，更多的是停棲著無憂無慮的鷺鷥和水鴨。

康熙 42 年（1703）來臺就任臺灣海防同知的孫元衡，寫過一首知名的〈瘴氣山水歌〉，[35] 其中描述了漢人尚未大量進入淡水河流域前的時代，濕地沼澤遍佈原野，瘴氣疾病籠罩大地的自然環境：

瘴山苦霧結胚胎，窮陰深墨堆枯煤。
赤日沈為死灰色，勁風萬古無由開。
下有長河名淡水，玉碗澄之清且旨。
化為碧血與鴆漿，殺人不見波濤起。
山有飛禽河有魚，上原下隰黃茆居。
島民生與瘴相習，諸蕃雜作古丘墟。

[32] 劉益昌，《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頁 113。
[33] 吳健蘭，〈大臺北地區原住民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頁 69。
[34]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46。
[35] 孫元衡，《赤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8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74。

墟中婺婦能為鬼，婆娑其舞歌笑娓。
舌語疑咒走疑癲，人瘴由來勝蛇虺。
嗟我禦暴分邊城，掃除無力空含情。
樵山飲水滋慚恧，仕宦五瘴良非輕。

根據孫元衡的觀察，當時淡水河流域觸目所及皆為森林莽原，空氣中散佈著山沼濃霧鬱結成的瘴癘之氣，大河中的水看似清甘誘人，飲之卻如鴆酒般殺人於無形之中，而這河水正是經山沼瘴氣污染而成充滿細菌與有害物質的毒液。

可以確定的是，當時沼澤地帶的面積比現在更為廣闊，由之腐草敗枝所醞釀散發出來，這些沼氣及污水內的蚊蟲細菌，所引發的瘟疫疾病，無論是當時所在的平埔族，或是後來進入的漢人，都是各族群的先民們，開墾及定居此地區的首要困難與最大挑戰。

（二）待解謎的 Baritschosen 族群

隨著時代的交替演變，臺灣北部的平埔族群由於繁衍日久及多次的遷徙，族系顯得紛雜多元，但大致上可用「凱達格蘭族」一詞（Ketangalan）來加以統稱。此接替十三行文化並活躍於臺北盆地歷史舞台的的一群人，[36] 其族群聚落的分布情形，出現於早期文獻記載者，當屬 17 世紀中葉，盤據於北海岸一帶之西班牙人的記錄。[37]

西班牙人將臺北盆地及淡水河口一帶稱為淡水（Tamchui）地區，又將臺北盆地之內的區域細分為 Senar、Pantao、Quipatao，以及 Lichoco 等地區，現今可知的是，Senar 是一個由 8 到 9 個村落組成的單位，而 Quipatao 位於山腳下，大約也有 8 到 9 個村子，並擁有大量的硫磺礦，Pantao 則位於淡水河的另一邊，該地區的河岸好像還有許多的村落，[38] 而 Lichoco 的村落則大部分散布在山中，由 2 個大村社所共同組成，約有兩、三百戶的規模，這個村社應該就是清代的文獻記載中，分布於基隆河流域中游北岸的「里族社」。[39]

1642 年，西班牙人被從臺灣南部北上的荷蘭人所驅逐，其後，荷蘭人支配了淡水河流域以北的區域，並對此區平埔族群的人口及村落的狀況，進行頗為詳細的調查，其成果則呈現於 17 世紀中葉的一份村落調查表之中。[40]

分析表 2-1-1 這份村落表可以看出，當時的荷蘭人是以不同地區作為分類人群

[36]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92。
[37]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2。
[38]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54。
[39]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06），頁 35-36。
[40]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82。

表 2-1-1　1650 年 3 月臺灣北部平埔族村落表

(1) 淡水河流域	(2) Pinorowan 流域	(3) 淡水堡壘以南	(4) Bassajos 村落	(5) Baritschoen	(6) Coullonders （龜崙人）
Kimassauw	Pinorouwan	Parrigon	Cajpary	Gagaisan	Kinary
Litsiouck	Raworawas	Parricoutsie	Quimaurie	Sousouly	Kimebouron
Kipatauw	Rujryck	-----	St. Jago	Terrisan(?)	Semalan
Touckunan(?)	Chiron	Pocael			Sassoulangten
Kirragenan	Ribats	Dockudukol			Kinorobourauw
Pourompon	Peitsie	Paipeitsie			Serritsera
Kimoitsie	Kourounangh	Warrewarre			Tobonnen
Cattayo	Quiware	Darridauw			Silgelibbe
Kimalitsigouwan		Parrewan			Binorauan
Kypanas		Routsoudt			Gingyn
Chinaer		Ballebal			Rachuuwan
Kypabe(?)		Taggawaer			Progobas
Kirabaraba		Hallabas			Raliraliras
Cackerlack		Warrouwar			
Toetona		Drauw			
Tappare		Tennatanangh			
		Mattatas			
		Sinanay			
		Gingingh			

資料來源：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102。

的標準，進而將臺北盆地與臺灣北部西海岸的平埔村落編為 6 個地域單位，這些單位分別是：(1) 淡水河流域，指的是分布於基隆河中下游流域一帶，以及關渡到淡水河口一帶的平埔村落；(2) Pinorowan 流域，指主要分布於新店溪中下游，以及介於新店溪與大漢溪間的平原上的村落；(3) 淡水堡壘以南，指稱淡水河口以南，從八里到大安溪一帶海岸平原的村落；(4) Bassajos 村落，是指分布於北海岸到三貂角一帶的村落；(5) Baritschosen 村落，指稱一特定地域或人群的相關村落，分布於淡水河西岸平原一帶。(6) Coullonders（龜崙人），可能是指分布於林口臺地、龜崙嶺及南崁溪流域的平埔族村落。[41] 這些村落群與清代文獻中的平埔社群，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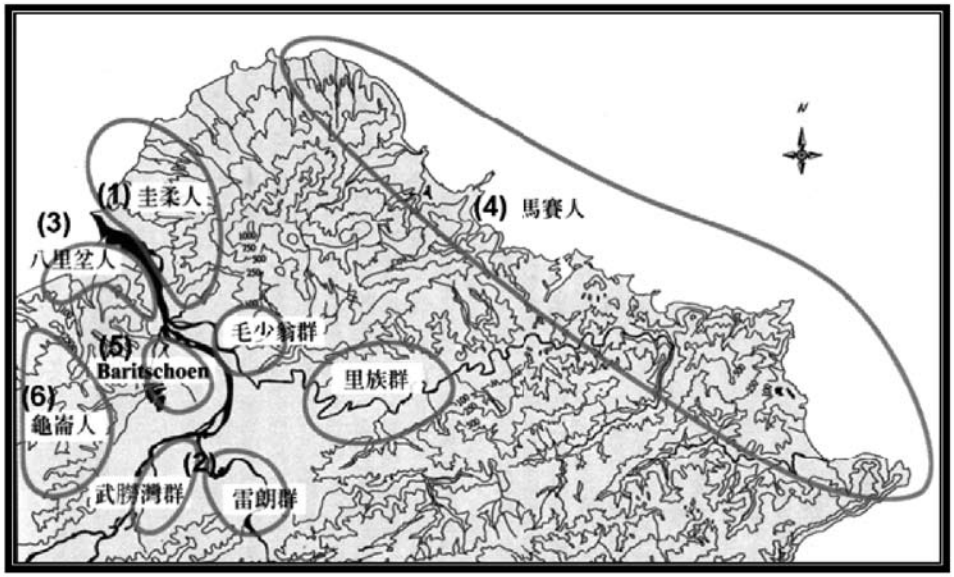

圖 2-1-1　臺北地區平埔族地域社群圖（摘自《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

緊密的關係，他們在臺北地區的分布概況，有如下圖所示。[42]

在 1650 年代的荷蘭文獻中，所出現的臺灣北部平埔族群，大多可以對應到日後，那些出現於清代文獻紀錄中的平埔番社。兩者彼此之間有著時間先後的相關延續性。根據詹素娟的考證，淡水河流域的村落可對應到清代的圭柔社、毛少翁社及里族社，Pinorowan 流域的村落是為武勞灣社及雷朗社的前身，淡水堡壘以南的村社則是屬於八里坌社人的居所，至於所謂的 Bassajos 村落可以對應到，分布地從北海岸綿延到宜蘭沿海地帶的馬賽人村社，而 Coullonders 則是荷蘭人給予清代龜崙社人的舊稱。[43]

然而，這些平埔族聚落之中，唯獨第 5 類的 Baritschosen 村落宛如像謎一般的消失於文獻之中，例外性的找尋不到其聚落族群後裔的身影，甚至於在同時期繪製的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中，也絲毫見不到此一村落的蹤跡。[44]

Baritschosen 這個失落族群的分布

[41] 詹素娟，〈分類的迷思－淡水河係原住民的族群類緣問題〉，收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國史館編，《1998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9），頁 12。

[42]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2。

[43] 詹素娟，〈分類的迷思－淡水河係原住民的族群類緣問題〉，頁 15-23。

[44]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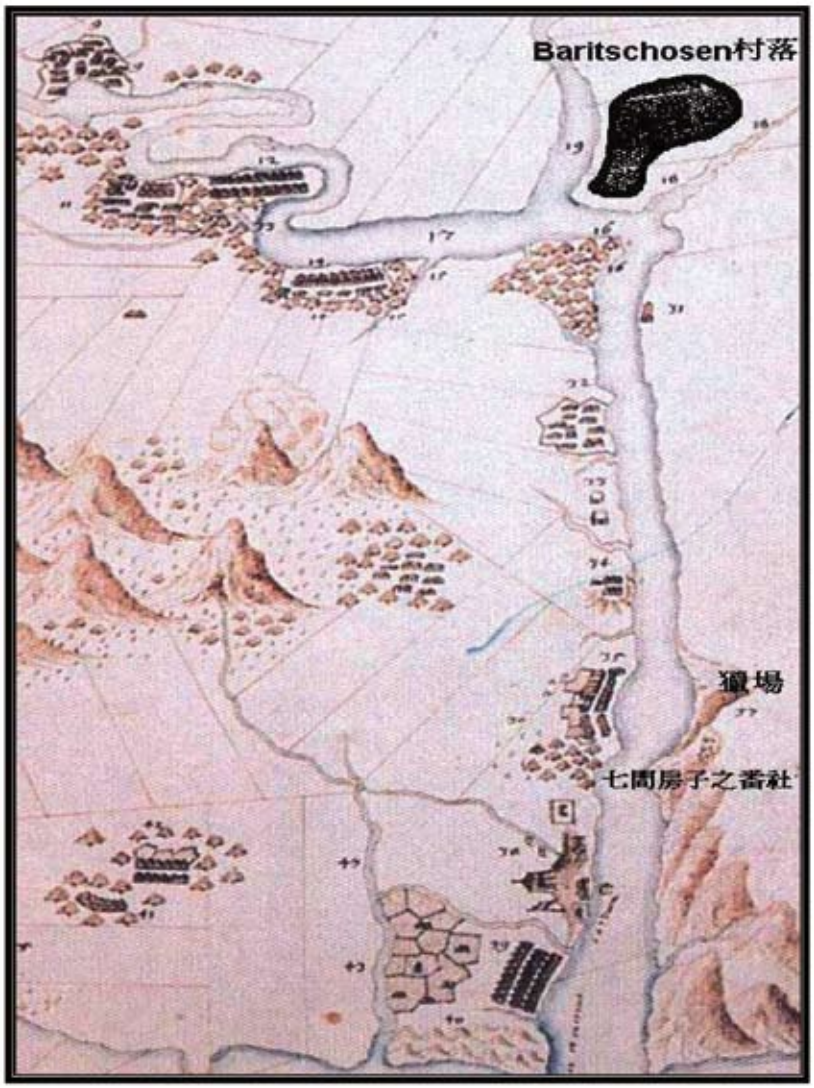

圖 2-1-2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部分）（摘自《大臺北古地圖考釋》）

Baritschosen 村落地點的標定，可以從翁佳音對於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的考訂中找到答案。[45]

研究缺乏文字史料的年代，欲觀察一地的自然及人文景觀，古地圖是一項重要的地理及歷史資料來源。現存關於臺灣北部的古地圖中，在康熙朝之前的內容以自然景觀的描繪為主，[46] 而這段時間正是康熙臺北湖淤積成陸的關鍵年代，與雍正以後的地圖比較，即可推估蘆洲土地露出康熙臺北大湖湖面的時間及地形地貌的變化，而要觀察這一系列古圖，需從臺北地區最早一幅完整描繪地形地貌及原住民村落的 1654 年古地圖開始看起。[47]

根據翁佳音的研究，在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中，鄰近淡水河主流的「獵場」（Jagers veldt，圖號 31 號），為今五股鄉地，包括了今日之蘆洲、五股、三重、新莊、泰山及樹林一帶的淡水河西岸平原。

[45]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5。

[46] 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臺北縣中和市：知書房，1996.06），頁 86。

[47] 翁佳音稱此圖為「第一幅臺北最詳細的地形圖」。參見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06），頁 15。

的成仔寮地區，[48] 而現今的蘆洲正位於冷水坑溪及成子寮的南邊不遠處。另外，圖號 16 的「野生灌木林河角」（Ruijgen Hoeck）為今日位於蘆洲對岸的關渡地區，是以推測 1654 年蘆洲的位置為圖號 16 的對岸、圖號 31 南方的地帶（〈圖 2-2-2〉黑色區域）。此時，距康熙 33 年（1694）的大地震仍有 40 年，故大湖尚未形成，蘆洲的土地仍未沉沒，為一片由冷水坑溪及淡水河主流所夾峙的河畔平原地帶，其地貌應與對岸關渡無異，仍為一片野生灌木、蘆葦、菅芒叢生的未開墾之地。[49]

翁氏將圖中 18 號的「Spruijt nae Gaijsan」(中文譯為「往海山之溪」)，確認為塭子川支流之一的冷水坑溪（又名五股坑溪），在此溪的南面，就是淡水河中下游西岸的平野，相當於今日臺北縣之蘆洲、五股、三重、新莊、泰山及樹林等鄉鎮市的轄區，而在大臺北古地圖中，這一大片地帶呈現著空曠的景象，並無任何平埔族聚落的分布，加上除了 Baritschosen 村落之外，其他五個地域單位都可以從後來的文獻中找到確切的相對位置，因此推斷 Baritschosen 村落的所在位置，由三個聚落所共同組成，為淡水河西岸平原一帶。[50]

根據明永曆 2 年（1648）的統計，共有 100 戶、327 人，在當時臺北地區的諸多平埔族村社中，是屬於規模較小者。[51] 但是，不會因為村落規模之小人口之少，就為荷蘭繪圖者所忽視不畫出來。那麼究竟要如何看待此問題，解釋地圖上的這片空白區域，以及文獻與地圖資料的衝突與之間的矛盾？

根據翁佳音的考訂，當時受命繪製此圖的人員，所接受的任務只限於描繪淡水與雞籠的地理及人文景觀，製圖的重點於是集中在北海岸、淡水河口到關渡間之河域，以及基隆河與新店溪沿岸地區，而自關渡以上的淡水河左岸一帶，則呈現一片空白，甚至確實存在於考古資料及清代文獻中的八里坌社聚落，皆不存在於地圖之中，顯示此圖有著只重右岸卻忽視左岸的繪圖原則，因此，圖中沒有畫出聚落的地區，並不代表就是無人之境。[52]

---

[48]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70-71。

[49]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27。

[50]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50、70、144。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105。

[51] 中村孝志主講，曹永和譯，〈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臺灣風物》，41：3（1991.09），頁 125。

[52]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6。

此外，在此圖 37 號觀音山的第 2 個山崙上，繪有大約由 7 間小房子組成的番社，而 31 號的「Jagers veldt」（中文譯名為「獵場」）之旁，也畫有形似房舍的黑點，不知是否為平埔族的獵人草寮或是獵場中的小聚落。[53] 從這些跡象來看，淡水河的左岸地區確實存在著人類的活動，而這些人文景觀，到底是不是同位於淡水河左岸的 Baritschosen 人所創造，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Baritschosen 村落應存在於淡水河西岸平原之上，地圖之不標示只是繪圖者的刻意忽略而已。[54]

根據詹素娟的研究，可能是「蘆洲人」於 17 世紀中葉之代表的 Baritschosen 人，不論是在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或是清代的文獻紀錄中皆不見其蹤影，而其所在的淡水河下游平原應該有著 3 個平埔聚落，但在現今的平埔族研究上，卻是一塊疏於研究的空白區域。[55] 那麼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在漢人移民入墾之前，蘆洲這塊土地上就完全沒有任何其他族群的存在，並未有平埔族人在此居住活動。事實上，我們仍可從些許零散的古地圖及文獻資料，以拼湊蛛絲馬跡的方式，試著追尋平埔族在蘆洲地區活動的模糊身影。[56]

早期學術界一直認為，在蘆洲地區是有平埔族番社存在的，這個番社被稱為「南港社」。日治中期研究臺灣地名的學者安倍明義，認為南港社的所在位置，是在當時新莊郡鷺洲庄和尚洲的大字南港子一帶；這個說法為戰後的張耀錡承繼，亦認定南港社在蘆洲南港子；直到潘英海書寫《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同胄篇》時，也採取同樣的解釋，將南港社的位置定於當時的臺北縣蘆洲鄉正義村，也就是蘆洲的南港子地區。因此，這個說法一直廣為後起學者所廣泛沿用，認定蘆洲地區有一個凱達格蘭族的南港社。[57]

南港社最早出現於文獻資料的記載中，是在康熙中葉繪製而成的「康熙臺灣輿圖」之中，圖中淡水河主流中游的左岸一帶，象徵性的描繪著 4 間茅屋及 4 片田園，與圖中其他番社相較，算是一處規模頗大的聚落，其旁並赫然書寫著「南港社，至蛤仔灘水路貳日」的字樣。其後，南港社也出現於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之

[53]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頁 134。

[54]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6。

[55] 詹素娟，〈分類的迷思－淡水河係原住民的族群類緣問題〉，頁 15-23。

[56]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7。

[57]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 30。張耀錡，〈平埔族社名對照表〉，《文獻專刊》2：1、2（1951）。潘英海，《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同胄篇》，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95)。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臺灣史研究》7：1（2000.06），頁 6。

中，郁氏是在描述淡北地區 23 社土官，齊聚前來見他時，提到了南港社之名：

> 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曰八里坌、麻少翁、內北頭、外北頭、雞洲山、大洞山、小雞籠、大雞籠、金包里、南港、瓦烈、擺折、里末、武溜灣、雷里、荖厘、繡朗、巴琅泵、奇武卒、答答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

從上述古圖及文獻資料的記載中，南港社的存在似乎毫無問題，但是在其他 17、18 世紀北臺的方志文獻中，卻未再度見到南港社的名字，而該社人丁與聚落的狀況也付之闕如，使得這兩份資料成為孤證，可靠性並不高。[58]

此外，《裨海紀遊》中的南港社，在書中僅出現過 1 次，而且並未說明此社確切的位置，而「康熙臺灣輿圖」中將南港社繪於淡水河主流之左岸，也就是今日蘆洲、三重、新莊等地所構成的淡水河西岸平原一帶，然而，這個區塊在 18 及 19 世紀的文獻中，皆找不到關於南港社的記載，如果此社確實存在於康熙中葉，不可能後來就憑空消失了。[59]

至於圖中「至蛤仔難水路貳日」的附註，更是疑點重重。王世慶認為，該圖對於今日淡水河 3 大支流的認識及描繪並不正確，從此社水路兩日可到宜蘭的蛤仔難可知，繪圖者是將位於基隆河流域的南港，誤繪於淡水河主流的左岸地帶了，因此，南港社的正確社址，應是今日臺北市東部的南港區。[60]

從上面的討論中，還是不能確定南港社是否真的存在，以及蘆洲是否就是南港社的舊址，但檢視過早期學者將南港社定位於蘆洲的理由之後，就可以發現他們的證據其實是相當薄弱的。在第二章後文中，將提到蘆洲有一個小地名，名喚「南港子」，此一地名的源由是來自於早年該地地勢低窪，終年水濕，泥土濕軟，為一爛泥地，當地並留有昔日水道的遺跡，加上臺灣人習慣將低濕地稱為「湳」，稱水道為「港」，此地因而被住民俗稱為「湳港子」，又因當地為位於淡水河南方的水邊濕地，所以又有「南港子」之名。[61] 然而，這個地名卻為日治中期研究臺灣地名的學者安倍明義所誤解，將文獻中的南港社與蘆洲的南港子勾連牽扯在一起，從此之後，蘆洲的南港子地區就憑空出現了一

---

[58]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7。

[59] 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頁 10。

[60]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1996.12），頁 8、77。

[61]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鄧麗君在蘆洲的歲月》（臺北：博揚文化，2001.10），頁 19。

個南港社。[62]

除此之外，我們再仔細回來檢視蘆洲的地形演變歷程，即可以發現康熙 33 年（1694）臺北大湖形成之前，蘆洲擁有平埔族的聚落，但蘆洲地區一經地層沉陷化為湖面之後，其上的住民非死即逃，不太可能留存其間生活。[63] 而 3 年之後郁永河所見到的南港社人，是否原居於蘆洲的平埔族，難以考證，但可以確知的是，至少在漢人進入南港子地區開墾之際，並無與平埔族接觸的紀錄流傳下來。[64]

據此可以推測，南港社並不存在於蘆洲南港子地區。論述至此，「南港社不存在於蘆洲地區的歷史之中」的論點是可以肯定的。[65] 然而，蘆洲平埔族群的存在，在後期的古圖、文獻，以及田野資料中，尚留存著些許蛛絲馬跡，使得這個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

在乾隆 25 年（1760）前後繪製而成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中，可以發現淡水河下游一帶存在著一塊三角形的大沙洲，其上繪有一個名為「和尚洲社」的聚落，是以「和尚洲社」應該也是一個番社，代表著當時的蘆洲地區存在著原住民的活動，那麼和尚洲社的主人是否為平埔族？從此圖在淡水廳段的上方，詳列著 23 個生番社，其中並無和尚洲社在列，顯示此社應屬淡北地區平埔族的熟番社之一。[66]

上面的推論似乎可以說明，在乾隆中葉這個時點，蘆洲地區存在著 1 個名為「和尚洲社」的平埔族番社，並間接證明了平埔族群曾在蘆洲活動過的推測。但是，只憑此一地圖之孤證，仍難以確切的肯定蘆洲有平埔族，留待後文再詳述清代史料的矛盾之處。

時序進入到日治時期，在大正 4 年（1915）的第 2 次臨時戶口調查中，在蘆洲的樓仔厝庄地區，調查出了兩男、6 女，共 8 人的平埔族人口，但在隨後幾次人口調查中，蘆洲地區就再也沒有出現平埔族人口。[67]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平埔族已日漸稀少，其遷徙與被同化為漢人的情形亦屬普遍，這 8 名平埔族人是否為原居蘆洲者之後裔，或是由外地遷居者，難以確認，

---

[62] 陳宗仁，〈南港社與北港社考釋－兼論清代臺北地區番丁銀制〉，「註 17」。

[63]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9。

[64] 劉還月、黃提銘撰文，〈不存在的歷史－關於南港社的幾點疑問〉，收於劉還月等著，《尋訪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與現況》（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10），頁 232-233。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鄧麗君在蘆洲的歲月》，頁 19。

[65]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29。

[66]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30。

[67] 詹素娟、劉益昌，《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專輯》，頁 146-163。

但可以肯定的是，平埔族於戰後的人口統計中已徹底消失，在戰後進行的口述歷史中，據一位李陳阿碧女士所言，蘆洲地區的忠孝路與民生街交叉口，有座祭祀無主孤魂的萬應公廟，鄉里耆老稱之為「番仔墓」，但仍不確定此廟與平埔族到底有何關係。

至今為止，平埔族的事跡在蘆洲地區僅以口述傳說的形式保留下來，還有待更多的文獻資料來證明其存在與否，蘆洲平埔族的身影，依舊擺盪於文獻與傳說之間模糊不清。[68]

第三節　清初的拓墾

一、清代康熙時期

繼 1654 年大臺北古地圖之後，描繪臺北地區地形地貌的古圖為「康熙臺灣輿圖」。此圖繪製的年代經過考證，約於康熙 24 年（1685）至康熙 43 年（1704）這段期間完成，並無確切的完成年代。[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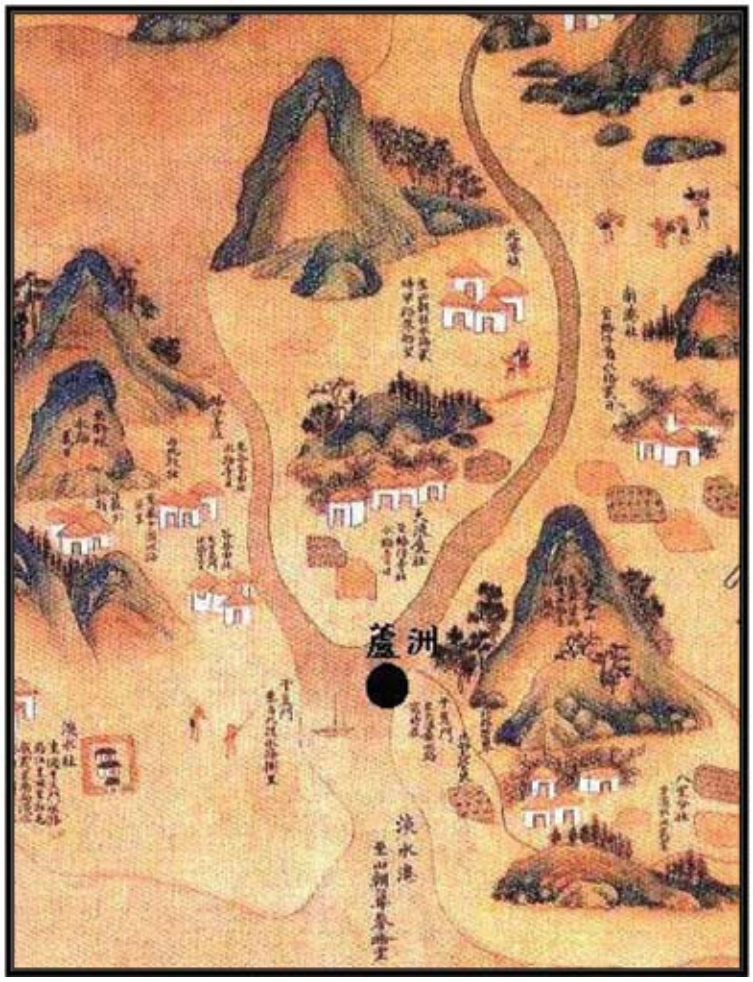

圖 2-1-3　康熙中葉臺灣輿圖（部分）（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註：圖中黑色區域為推測當時蘆洲所在之位置。[70]

但是我們從此古地圖中，可以發現今日關渡附近的河面頗為寬闊，與現在大家所熟知的關渡隘口，其地形的狹窄不成比例。由此可以推斷出，此圖應該為康熙臺北大湖形成後所繪製，此時的蘆洲地區應

[6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蘆洲鄉分組座談〉，收於《臺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592。

[69] 陳漢光、賴永祥，《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10），頁 6。

[70] 引用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27 圖。

已陷落而沉入湖底，詳細的地形無法看得見，當然也無法開發與拓墾。

在「康熙臺灣輿圖」中，康熙臺北大湖的範圍並不太明顯，但是另外 1 幅「諸羅縣山川總圖」的湖域界限卻十分清晰清楚，由此可以確切肯定大湖的存在。

此古地圖為康熙 55 年（1711）由陳夢林所修之《諸羅縣志》的卷首圖，[71] 繪製的時間應該在修志完成不久之前，此時間距離大湖成形已有二十餘年之久，但觀察八里坌山（今觀音山脈）與湖畔間鮮有土地，並無湖濱平原存在的情形，可知此時康熙臺北大湖淤積成陸的進度很慢，幾乎無甚進展可觀察，因此蘆洲地區仍在湖底，等待湖水的退卻及淡水河的泥沙沖積，可以早點重見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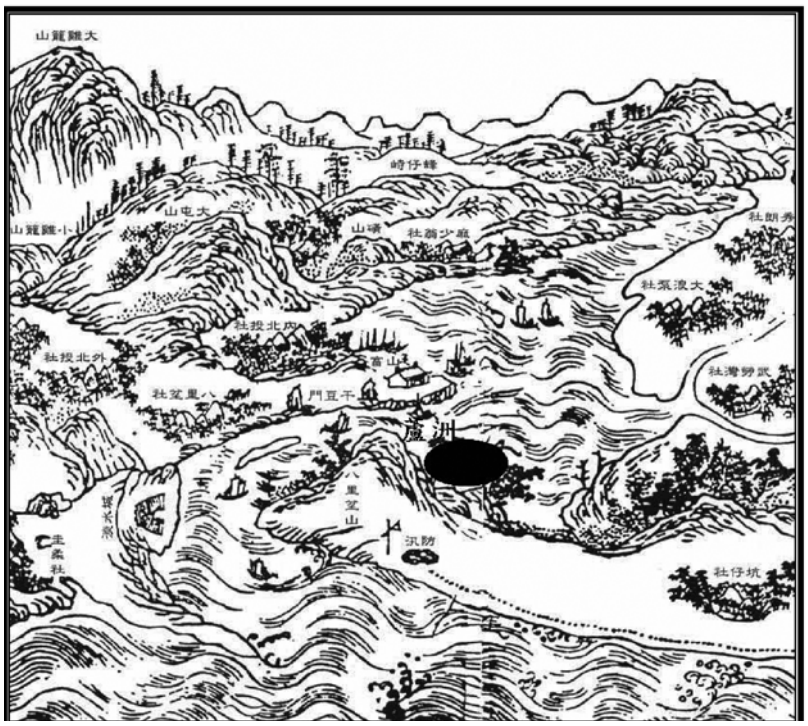

圖 2-1-4　康熙 55 年（1711）諸羅縣山川總圖（部分）圖（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註：圖中黑色區域為筆者推測當時蘆洲所在之位置。[72]

二、清代雍正與乾隆初期

蘆洲地區的浮出水面在雍正年間（1723-1735）露出一線曙光，這可由「雍正臺灣輿圖」的內容及蘆洲地區的開墾歷史間的交互比對，探得端倪。與「諸羅縣山川總圖」相較，雖然湖域仍廣，但「雍正臺灣輿圖」中出露的土地顯得較多，大湖西畔的橫直埔及東畔關渡一帶的平原已儼然成形，其後淤積成陸的蘆洲地區即位於橫直埔平野的北面地帶上。[73]

圖中的「橫直山」及其東麓的「橫直埔」又被稱為「興直山」及「興直埔」，

[71] 陳漢光、賴永祥，《北臺古輿圖集》，頁 8。
[72] 引用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28 圖。
[73] 引用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27 圖。

圖 2-1-5　雍正中葉臺灣輿圖（部分）（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註：圖中黑色區域為推測當時蘆洲所在之位置，其下為橫直埔。[74]

概取其音近；另有一說由翁佳音提出，他認為「興直」可能是來自於荷蘭文「Haring」或原住民語「Haetingh」，因與閩音「heng-in」音近，而被轉用為漢文地名「興直」。興直埔即今日淡水河下游西岸的新莊平原之前身，約略包括今泰山、新莊、三重、蘆洲及五股一帶的平野。[75]

另一方面，「雍正臺灣輿圖」的繪製年代為雍正5年（1727）到雍正12年（1734）之間，而這段期間正是蘆洲地區最早有漢人前來開墾的年代，最早被開闢者為北面的水湳地區。

本地最早的開墾記錄為清雍正2年（1724），廣東人及泉州人由八里坌口登岸前來河上洲開墾荒埔為園；雍正5年（1727）貢生楊道弘請墾「興直埔有荒地一所，東至港西至八里金山腳南至海山山尾北至干苣山」，此地區包括現今蘆洲、三重、新莊及五股一帶。[76]

因為可證明蘆洲的初墾年代的史料甚為零星，並無地契文書之資料出現，多為傳說及口述的紀錄，較為可信的資料為日治初期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所提交上級的《參事答案》中之記載，這份資料亦為後

[74] 引用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29圖。

[75] 尹章義等，《泰山志》（臺北縣泰山鄉：泰山鄉公所，1994.07），頁60。翁佳音，〈舊地名考證與歷史研究－兼論臺北舊興直、海山堡的地名起源〉，收於翁氏著，《異論臺灣史》（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1.02），頁291-292。

[76] 吳惠敏，《蘆洲的大神將》（臺北市：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頁11。

來的研究者廣為沿用。

其中提到，雍正 7 年（1729），由北部早期的開發據點八里坌某戶業主招佃，經由觀音山麓進入墾殖今蘆洲水湳地區，為蘆洲地區最初的開闢者；雍正 10 年（1732），閩粵富商由八里坌沿著觀音山山麓招佃開墾，像新庄移墾，河上洲因為地當其中路，乃為開拓，故亦有中路庄之名，又因有河水環拱，亦有河上洲之名。[77] 其後獅仔頭、庚寮庄（今更寮）、和尚庄（今蘆洲）、新庄（今新莊）及山腳（今泰山）先後開闢。根據這份資料，蘆洲的初期拓墾約在雍正 7 年到 11 年（1729-1734）這段期間。[78] 雍正 11 年（1734）由於移民的增加，於八里坌設立巡檢司，為加強管理北部淡水河流域，特別是下游臺北盆地區域，其週邊平原的商人與移民越來越多，或買或墾，雍正 11（1734）年於水湳地區建立小村市，名河上洲。又於新庄建一大街市，名日新庄街。八里坌、河上洲、新庄街三地成為淡水河兩岸三街市。[79]

蘆洲中路張氏家族，外界文獻多以張溫為代表人物，但其實他並不是中路張家的渡臺開基始租，而是他父親張恭。根據來臺第 3 代張延玉在道光年間（約 1830 年代）回到大陸廈門抄錄族譜所載，中路張家是由張恭在 19 歲時遷臺拓墾闢建，他生於康熙戊子 47 年（1708），來臺時為清雍正丙午 4 年（1726），如這一記載無誤，已是目前蘆洲開發歷史上最早抵達的家族文獻。張溫則是生於清乾隆辛未 16 年（1751），關於中路張氏一族的歷史淵源大致根據遷臺第三代張延玉赴唐山抄錄族譜加上後人考證所成。[80]

漢人得以開墾即表示蘆洲已有部分土地出露，且這些土地有其利用價值，並非全為不可耕種的荒灘地。由此可以推斷，雍正年間的蘆洲地區已在河川的沖積下逐漸淤積成陸，但可能仍有部分的土地在湖面之下。經歷了康熙及雍正兩朝的河沙沖積，大湖到了乾隆初年已進一步的淤積成陸，這可從圖 2-1-6 中大湖範圍縮減及關渡隘口窄化的情形得到證明。此外，湖水退卻的規模也可能逐漸加大。

事實上，關渡宮在建廟之初（康熙 54 年，1715），曾因怕關渡位於湖邊會有水患，於是將關渡宮建於山上，而後來會遷建山麓，是因為康熙 56 年（1717）臺北大湖水位有了第 1 次的下降，香客從渡口

[77] 吳惠敏，《蘆洲的大神將》，頁 11。

[78] 楊雲萍，〈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些資料〉，收於《臺北縣文獻叢輯 • 第二輯》(臺北：成文，1983)，頁 438。

[79] 吳惠敏，《蘆洲的大神將》，頁 12。

[80] 楊蓮福，《蘆洲古厝的故事》（臺北：博揚文化，2006），頁 103-104。

圖 2-1-6　乾隆 6 年（1741）淡水圖（部分）（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註：圖中黑色區域為筆者推測當時蘆洲所在之位置。[81]

到廟的距離因而拉遠，為了方便起見而將廟移建距水較近的山腳。[82] 從康熙 58 年（1719）關渡宮往下遷建於山麓的狀況來看，自康熙末年，大湖的湖水就因四周河流泥沙不斷流入湖內，湖底也沉澱了細軟泥土，使得湖水高出海平面，最後由湖畔最低處流出，下切湖盆成一缺口，即今之關渡隘口；再加上臺北盆地地盤的隆升，湖水即由關渡隘口大量流出。[83] 於是，大湖在河沙沖積及湖水退卻的雙重影響之下，其範圍的縮減漸趨明顯，而蘆洲出露土地的區域也就隨之漸廣。

第四節　清代中葉的開發

一、乾隆中葉的蘆洲「和尚洲社」

在乾隆 25 年（1760）前後繪製而成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中，可以發現淡水河下游一帶存在著一塊三角形的大沙洲，其上繪有一個名為「和尚洲社」的聚落，「和尚洲」即為蘆洲的舊稱，然而這個以「社」為名的聚落，究竟是不是屬於平埔族的番社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此份古圖的性質來加以考察。而在這份地圖的圖首，有段文字說明圖中紅線和藍線的意義與分布：

圖內民番界址，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定界。臺、鳳、諸三

[81] 引用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30 圖。
[82] 紀榮達，〈淡水河口寺廟系列－關渡宮（一）〉，收於國史館編，《1998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9），頁 402-403。
[83] 鄧天德，〈臺北盆地洪患地理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頁 6。

屬用紅線，源其舊也；淡防屬向無通身畫界，只山口設碑也，今依新定界用藍線；彰屬則于舊界之外間置新界，故紅藍並用。僅分別繪畫如左。

從上述的圖說中，可以確認這是 1 幅用以分別民番界限的番界圖。因此，圖中對於生番社、歸化番社（熟番社），以及新舊番界、界碑、禁地、隘及塘汛等防止漢番互侵的設施，畫得特別詳細。[84]

此外，圖中也將漢人的村庄標示出來，以分別番社與漢庄。由此看來，這幅番界圖中的「社」當屬原住民的番社無疑，是以「和尚洲社」應該也是 1 個番社，代表著當時的蘆洲地區，似乎存在著原住民的活動，那麼和尚洲社的主人是否為平埔族聚落？從此圖在淡水廳段的上方，詳列著 23 個生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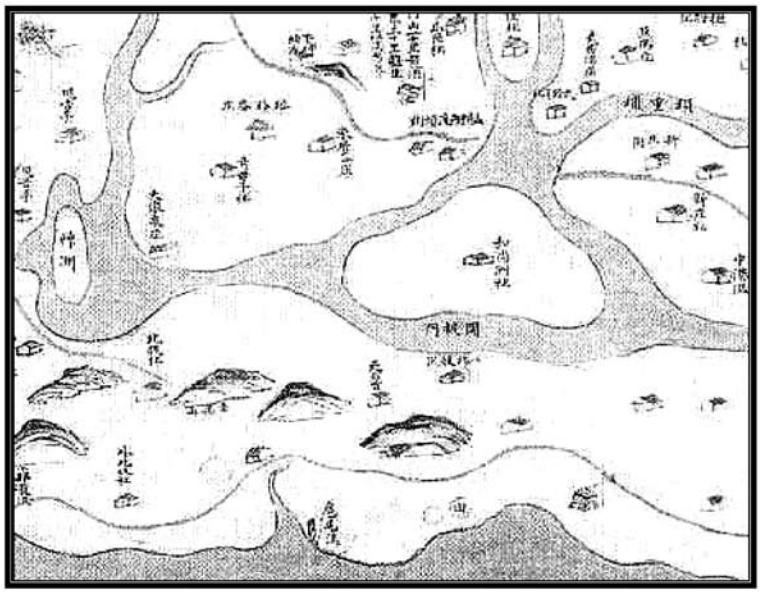

圖 2-1-7　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摘自〈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圖 2-1-8　乾隆中葉臺灣輿圖（部分）（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註：此圖中間偏左下之大沙洲為當時蘆洲所在之位置。[85]

[84] 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1991.06），頁 47。

[85]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31 圖。

社，其中並無和尚洲社在列，顯示此社應屬淡北地區平埔族的熟番社之一。

上面的推論似乎可以說明，在乾隆中葉這個時點，蘆洲地區存在著 1 個名為「和尚洲社」的平埔族番社，並直接證明了平埔族群曾在蘆洲區域活動過的推測。但是，只憑此一地圖之孤證，仍難以確切的肯定蘆洲有平埔族，而同時期的一些史料，更使此一疑案無法完全的釐清。

疑點之一在於，同時期繪成的「乾隆臺灣輿圖」中（詳見圖 2-1-8），也有一個四面臨河的大沙洲，但上面標示的地名卻是「和尚洲庄」，此莊屬於所有權由官方掌握的官莊性質。

和尚洲於乾隆 22 年（1757）成為官莊，[86] 而當時官方容許漢人開墾的土地，不論是官莊或民莊，首要條件在於當地必需「民番無礙」，也就是不許漢人侵占平埔族原有的土地，屬於官方的官庄應該更會嚴守這個原則，如果和尚洲社的平埔族已先漢人存在於這片沙洲上，官方應當不會選擇此地開拓成庄。[87] 相對的，蘆洲既已被官方開闢成莊，平埔族番社的存在性則大有問題。

如前所述，到乾隆中期為止，平埔族與蘆洲的關係是可疑又迷濛的，同樣的，從清治中期到日治時代這一階段，有關於蘆洲的平埔族史料所傳達的訊息，也相當的模糊難辨。現存於蘆洲境內，提及疑似平埔族活動跡象的田野資料，當屬九芎公廟前之〈九芎公興建序〉碑記：

> ……再稽考當嘉慶十四年間，本鄉西南邊境地區，均為山地土人所有。當時滬尾居民因受土人騷擾劫掠，寡不敵眾，向本鄉請派勇士援救，事為土人探悉，遂傾巢來犯，致本鄉危在旦夕，當時父老焦急萬狀，即召集全鄉人等，在邊界佈防堅守，一面向滬尾告急，一面向九芎樹祈禱，祝告延平郡王，保我鄉民，轉危為安，則今後三年一醮祭祀，子孫永世不忘，結果將土人擊敗，合鄉平安無事，時值寅年十月，鄉民等因感此次祈安靈驗，同沐神恩，遂定寅、申、巳、亥年為祈安福醮之年，此為本鄉懋德宮舉行三年一醮祭祀之創始。[88]

在這篇碑記中很明確的指出，蘆洲的西南邊境是「山地土人」所有的活動空間，並不時侵犯漢莊，與漢人的關係似乎頗為緊張。但可疑的是，蘆洲是一片平坦的沙洲，西南境並無山脈，如果勉強要找出西南方的「山地土人」，那就是座落於遠方龜崙嶺山脈的龜崙社，或是以淡水河

[86] 溫振華，〈蘆洲湧蓮寺 -- 一座鄉廟的形成〉，《北縣文化》50（1996.10），頁 6。

[87] 溫振華，〈清代武灣社社史〉，《臺灣史蹟》36（2000.06），頁 143。

[88] 此碑現置於蘆洲市九芎里，九芎路與 121 巷交叉口路島上之九芎公廟前。

西岸平原為獵場的武勝灣社，[89] 但這兩社距離蘆洲過於遙遠，不太可能做出一聞訊就立即來犯的舉動。因此，碑中提到的「山地土人」究竟屬於何社？或者根本只是鄉野傳說，基於相關文獻的不足，實在難以確認。

另外，碑中又提到當時鄉人面對土人來襲的險境，向鄭成功所栽的九芎樹祈求勝利，其後擊退土人，為感念神恩而發起 3 年 1 醮的祭典，並成為了往後蘆洲 3 年 1 度國姓醮的典故源由。

事實上，蘆洲國姓醮的源起，有著另一個相似的傳說：這 1 個關於國姓醮源起的說法，來自清季蘆洲的地方士紳李雲雷於明治 35 年（1902）撰寫的〈鄭成功祭祀記〉，現保存在主祀鄭成功的懋德宮正殿對牆上之碑記中。祭祀記中提到，嘉慶 14 年（1809）滬尾發生漳泉械鬥，於是蘆洲的泉人出動大批人馬，往救滬尾泉人，使得新莊的漳客得訊趁機攻向蘆洲邊界，蘆洲剩餘的鄉人只好一面派人通知在滬之蘆洲泉人，一面向開山聖王鄭成功祈禱，請求保佑蘆洲的平安，並承諾勝利之後必 3 年 1 醮，以報神恩，其後蘆洲鄉人果然擊退了新莊漳客，此後蘆洲即開啟了 3 年 1 度國姓醮的習俗。[90]

只是其中的侵襲滬尾者，換成了漳泉械鬥中的漳洲人，而趁機來犯的敵人，則變成了同來自於西南方新莊的漳洲客家人，至於其餘情節則極為雷同，讓人不禁懷疑兩個傳說是否出於同一源頭，其後為了增強各自廟宇發源的神聖性，進而輾轉改編引用之。嘉慶 14 年（1809），臺北地區確實發生了規模頗大的漳泉械鬥，但卻無山地土人侵擾平地的記載 [91]。因此，土人之說的可信度頗低，蘆洲存在平埔族的說法，仍停留在民間傳說的階段。[92]

二、乾隆中葉後的蘆洲地形

（一）古地圖中的地形

首先，我們透過古地圖，才能了解剛從剛從康熙臺北大湖浮出來的蘆洲之沙洲地形。淡水河下游河道與沙洲所在，與今日相關位置有很大差異，在《淡水廳志》中記載，[93] 乾隆 19 年（1754）又發生一場地震，使社子沙洲再陷落，居住其上的麻少翁社人，搬遷到較高的天母三角埔一帶地區。[94]

此時的蘆洲想必也將再度陷落湖中，

[89] 溫振華，〈清代武灣社社史〉，頁 143。
[90] 李雲雷，〈鄭成功祭祀記〉，碑記原文抄錄稿（1902）。
[91] 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市：遠流，2000），頁 62。
[92] 李進億、楊蓮福，《臺灣環境發展與蘆洲》，頁 131-133。
[93]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6），頁 348。
[94] 伊能嘉距著、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旅行》（台北：遠流出版社，1871 原版 1995 再版），頁 348。

只是規模大小不得而知，這同時也充分證明，淡水河與基隆河下游老年期地形的特色，河道的變遷擺動，甚至不用地震等重大的天然災害，往往一場洪水即可改變其地形地貌。[95] 今日蘆洲的大部分土地約在乾隆中葉大體形成，這可從約在乾隆中葉繪製而成的「乾隆臺灣輿圖」中清楚的觀察到。圖中有一四面臨河的大沙洲，上面標示的地名為「和尚洲庄」，並有田、園各 1 處，這就是蘆洲地區在乾隆中葉的地形概況。

（二）關渡宮與官庄開發

清乾隆年間自關渡宮和尚在和尚洲招個農開闢並設館徵收租穀。就蘆洲現存年代最早的一張契約，說明蘆洲部分地區之土地產權為官方所有，大部分土地產權都和關渡媽祖宮有關，如簡義雄所提供乾隆 51 年（1786）黃家立杜盡根賣契即載明：

深

立杜盡根賣契人黃政觀有買得呂包埔園壹所坐落主名溪墘厝…

川

共納隆恩租粟參斗陸升七合八勺，又納媽祖香資壹石參斗肆升今因乏銀

別創將政等所買呂包埔園等項先問叔兄弟侄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李正助

李春、李鳥、李機、李論觀還盡賣出時價佛頭銀參佰壹拾大員正銀即月中收訖埔等項物業隨付銀主前去起耕招佃或起蓋居住栽植粿木永為己業

關渡宮	媽祖業主即 僧意松圖記

乾　隆　五　拾　壹　年　捌　月

分府徐府諭粮書陳鴻稽查過戶

批明先年黃向艋舺信成號典借銀項之典…[96]

契約中所載地名為溪墘厝，今蘆洲市溪墘里、樹德里等地，共納隆恩租粟即說明土地所有權之官有性質，媽祖香資即繳納關渡媽祖宮的香油錢，此一契約證明白乾隆末期已有官庄及媽祖宮香油錢的存在，而且媽祖宮的土地產權並不只限在蘆洲水湳地區，連溪墘庄、中路庄、樓仔厝庄，都是關渡宮的產業，由以下契約可見之：

仝立合約、字保生大帝西河眾弟子等與林天談兄合夥用銀陸佰大元仝買得和尚洲庄林養田業壹所四至界址俱登載大契內明白每年帶納關渡媽祖宮香燈粟租壹石外瞨有小租粟陸拾捌石對半均分當日通同公議西河眾弟子等應份之業議瞨與天淡等兄弟自備無利磧地銀貳拾大元夜付爐主並自備工本耕作法心耕築田坵保顧塭岸永付其耕值年爐主不得貪價別瞨每年早晚二

[95] 王志文主編，《滄海桑田話社子》（臺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2001），頁 24。

[96]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75。

季天淡自當小租參拾肆石耕風煽淨不敢濕有依時粟價崇交爐主抑或將租粟交納不得少欠如是少欠聽其起耕另招佃並扣抵磧銀此乃耗業值爐主侯居期到大隆同宮演戲慶祝保生大帝千秋稍批此約字付值年爐主承接

公見代筆值年爐主

嘉慶貳拾肆年拾金月[97]

連共同奉祀保生大帝的林姓家族，取得的和尚洲庄今水河里一帶一塊地，也需繳納關渡媽祖宮香燈租栗即香油錢，同樣地在蘆洲李氏家族收藏契約文書彙編的契約提到：

立起耕典園契字人陳佛，有承祖父闔書內應得買過鍾捷園分得壹段在西勢，坐落土名和尚洲中路頭莊。東到李家園，西至李家園，南至橫路，北到車路，四至界址明白，年配納關渡媽祖大租穀七鬥正。今因乏銀別創，托中引就向李長利出首承典，三面議定依時值典價銀貳佰大圓正。銀即日仝中交佛親收足訖，園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起耕掌管稅抵利，不敢異言阻擋。其園限捌年爲滿，限滿之日，□贖回原字，當於八月半前先送到定頭銀貳拾圓爲憑，各不得刁難。保此園系佛承祖父闔分應得物業，與別房無干，亦無重張典挂他人及來歷交加不明爲礙，如有不明等情，佛出首一力抵擋，不幹銀主之事。此系二比甘願，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起耕典契字壹紙並繳闔書壹紙共二紙付執爲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典字內佛銀式佰大圓完足炤。

一批明其買契系濺收存要用之日取出公看不得刁難炤。

代書人　　家順

爲中人　　叔文傳

在場知見人　　步祖

光緒陸年十一月十七日，

立起耕典園契字人　陳佛

契書中提和尚洲中路頭莊一地約今中原里、光華里一帶，也要繳納關渡媽祖大租，同樣在陳惶儒提供的同治年間契書中，也提到舊港嘴今樓仔厝里、復興里一帶，也要繳納關渡媽祖大租。

蘆洲農民從乾隆年間向關渡媽祖宮繳納香油錢，其間經百餘年沒有改變，日人治臺初期仍沿襲，甚至和尚洲公學校今蘆洲國小建校初期經費短缺，地方人士建議，以這筆香油錢捐做學校長期的收入，「雖無其他收入，惟和尚洲民長久以來一直有向關渡媽祖廟繳納大租的習慣，這是信徒各自捐獻的香油錢，目前是該廟的財產，但此種奉獻毫無義務性可言，所以將其充當學校的收入如何？」日本校務當局，為顧及將來與關渡媽祖廟發生糾紛，

[97]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76。

不敢馬上決定，直到明治 32 年（1899）10 月 27 日，人民總代表張媽但、李毛獅決定將部分香油錢，當做公學校之永久經費，不過卻發生多數人民唯恐關渡媽祖廟有意見，遲遲不願交錢。明治 32 年（1899），僅募得 40 圓，加上學租補助金 200 圓，共 240 圓。[98]

從這些蘆洲早期契書及和尚洲公學校用香油錢做為學校經費的事實來看，可歸納出幾個方向：

(1) 關渡媽祖宮的產權遍及蘆洲各聚落，不僅水湳庄、和尚洲庄是它的屬地，連中路庄、舊港嘴（樓仔厝舊名）、溪墘庄等土地，都要繳納大租即媽祖香油錢給關渡宮。當時官庄土地的範圍是否和媽祖廟產權的範圈相同，彼此之間關係要更多資料來佐證。

(2) 從乾隆 20 年到明治 32 年（1755-1899）約 150 年的時間，關渡媽祖宮和蘆洲一地維持業主與佃農的關係，任何土地交易買賣，仍須繳納媽祖宮香燈租栗直接轉移，因此蘆洲土地開發與關渡宮息息相關。

（三）「咸草埔」的爭議

在同治 10 年（1871）出版的《淡水廳志》卷首，有一幅「淡水廳全圖」（詳見圖 2-1-12），圖中的淡水河下游有一座大沙洲，圖中標示為「咸草埔」，旁邊尚有許多小沙洲。從地名可推知此沙洲為一盛植鹹草之地，至於「咸草埔」為今日之蘆洲，或是社子島，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大抵研究蘆洲的鄉土學者就稱之為蘆洲的舊址，而研究社子鄉土史者則將之歸入社子島的領域；然而考訂同治至光緒年間的北部古地圖（詳見圖 2-1-9~2-1-15），諸圖中的蘆洲四周尚有頗寬的河溝環繞，而社子島可能因面積不如蘆洲寬廣而不見於這些古圖。在這些地圖中，蘆洲與「咸草埔」不論在形狀或水文狀況上頗為相似，由此可約略推斷，當時仍位於河道之中，四周有水道環繞的「咸草埔」應該就是今日蘆洲的舊址。[99]

但是，在「咸草埔」沙洲隔河左邊，河岸有一地名「九芎腳」，不正是今日「九芎里」的所在，而社子沙洲地形的葫蘆腰所在地名「溪洲底」意謂「河床」之意，正是在此圖所呈現的河道處。誠如上文所說，在老年期的地形，河道的變遷改道是很容易的，甚至淤積消失，下次洪水來又沖出恢復，也是常發生之事。

社子的開發也是乾隆中葉後開始，代表此時期地形也穩定了，加上此時期的山水畫地圖，不夠精準無法判斷地形河道相

[98]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78。

[99]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73 註 111。

對位置，只能由地名定位聚落之所在。因此，此時漢人已經入墾蘆洲成庄，將「九芎腳」附近認為是今日蘆洲，再加上河道彎曲地形的吻合，那「咸草埔」自然就是今日的社子沙洲所在，[100] 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判斷；在這種沒有比例尺的地圖，圖上又畫上許多空白的河中沙洲，再加上此時期，淡水河在此地河川改道與沙洲浮沉是常有之事，這樣的爭議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只是說明無論社子或蘆洲，「咸草埔」古地名代表感潮河川鹹淡水混雜，適合鹹草生長的生態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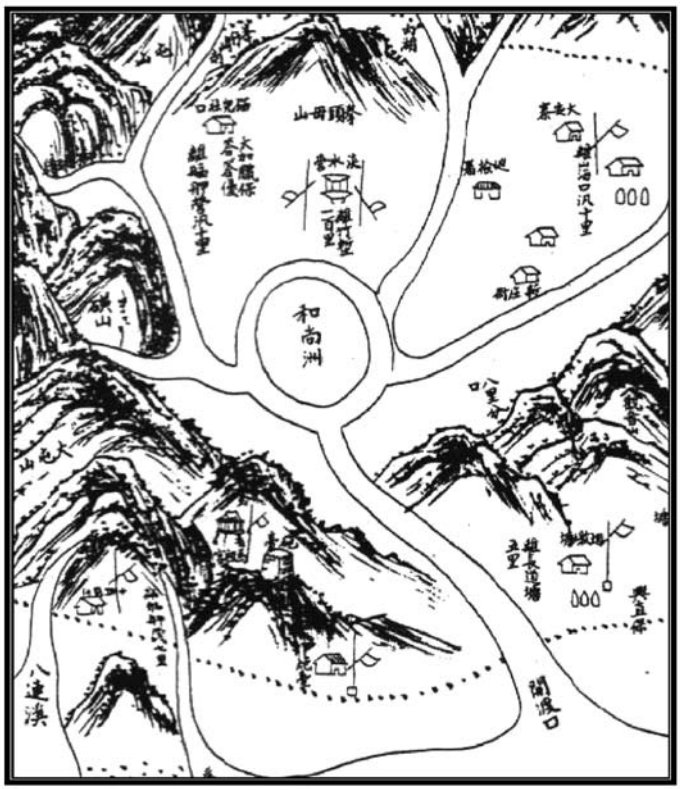

圖 2-1-9　乾隆 29 年 ~53 年間（1764~1788）臺灣軍備圖
（摘自《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

無論如何此時漢人已經入墾成庄，代表蘆洲已不再全是淤泥地及隨潮汐漲退而浮沉的蘆草蔓生地帶，經過雍正中期以來的開墾，出現了聚落及農田等人文景觀，正式成為一個穩定成長的聚落至今，這是蘆洲地形地貌上的一大變遷。從此之後，蘆洲在古圖中所呈現出的地形景觀與「乾隆臺灣輿圖」大同小異，直到清末至日治初期這段期間的地圖中，蘆洲西面、南面及北面的河道逐漸因河沙的沖積而萎縮成大型溝渠，成為了今日洲仔尾溝、鴨母港溝及水湳溝的前身。（詳見圖 2-1-9~ 2-1-15）

蘆洲地區內墾荒，由河畔往內陸之關鍵，與乾隆年間大臺北地區水利整治有很大關係，特別是灌溉今板橋、樹林、新莊、三重、蘆洲一帶的張厝圳，對於本區的農業發展影響最鉅。

張厝圳延伸至蘆洲者為三重埔支線，舊稱後港仔，在日治時期之前是一條兼具灌溉效果與航運功能的大圳溝。後港仔的圳路向北延伸至蘆洲邊境其後一分為二：其中一道圳港開往東北方的分子尾、溪尾地區，灌溉三重埔東北部及蘆洲東部的田

[100] 王志文主編，《滄海桑田話社子》，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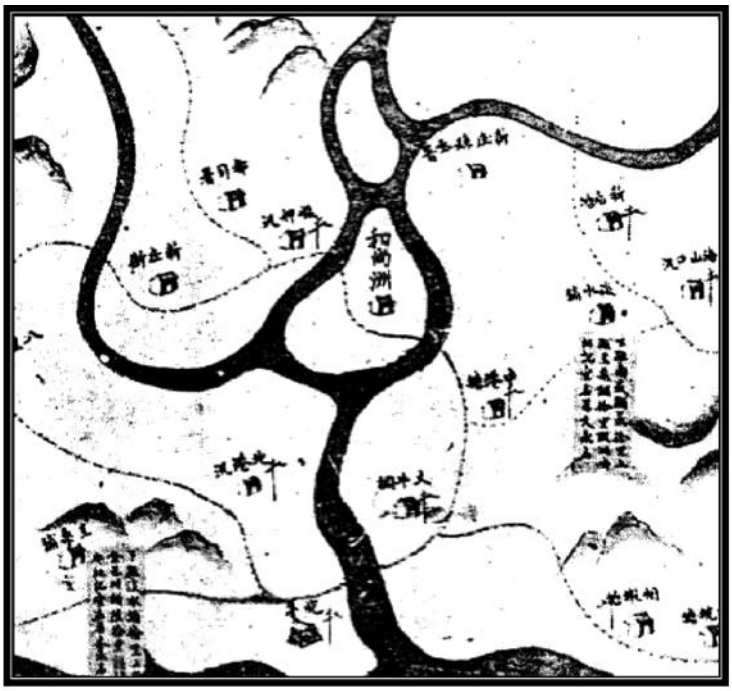

圖 2-1-10　乾隆 55 年～嘉慶 14 年間（1790~1809）臺灣郵傳圖（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園，此即「鴨母港仔」，又稱溪尾圳。另一道則進入蘆洲境內，成為和尚洲圳的主幹，此圳在蘆洲境內密集分支，構成一個頗為細密的灌溉網路。

張厝圳的開發，使得蘆洲農墾重心由淡水河沿岸的水湳地區，擴展至其他地勢較高的區域，市街中心也轉移至位於境內地勢最高、受水患侵擾狀況最輕微的店仔口一帶，此區自咸豐、同治年間，逐漸取代和尚港及舊港嘴，成為蘆洲最主要的市街地。[101]

圖 2-1-11　同治初年（1862~）淡水廳圖（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圖 2-1-12　同治 10 年（1871）淡水廳全圖（部分）（摘自《淡水廳志》）

[101] 吳敏惠，《蘆洲的大神將》，頁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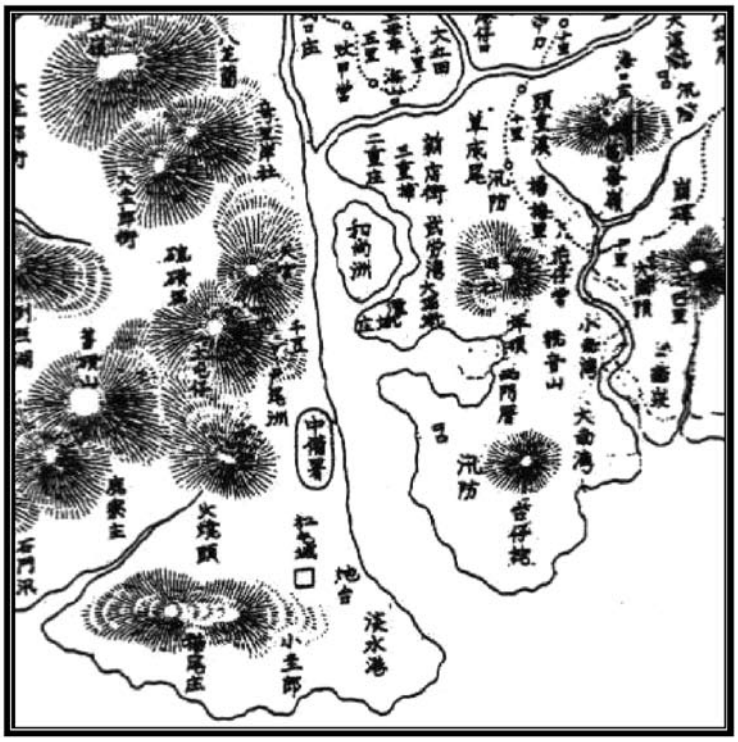

圖 2-1-13　臺灣島清國屬地北部圖同治 12 年（1873）（摘自《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

三、漢移民家族的開墾

清代中期以來，福建沿海的移民一批一批地來到了這塊尚未開發的土地，篳路藍縷，辛勤耕作，逐漸把這片水澤之地開發成臺北的魚米之鄉。自清代前、中期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移民不斷移居蘆洲以來，其中以泉州府同安縣各氏族人尤為重要，當然其他地區先民也有不少貢獻，使得原先一片荒涼的水澤之鄉，逐漸民居遍佈，炊煙繚繞，發展出水滴、溪墘、中路、南港、樓仔厝等

圖 2-1-14　淡水縣輿圖光緒 5 年（1879）（摘自《北臺古輿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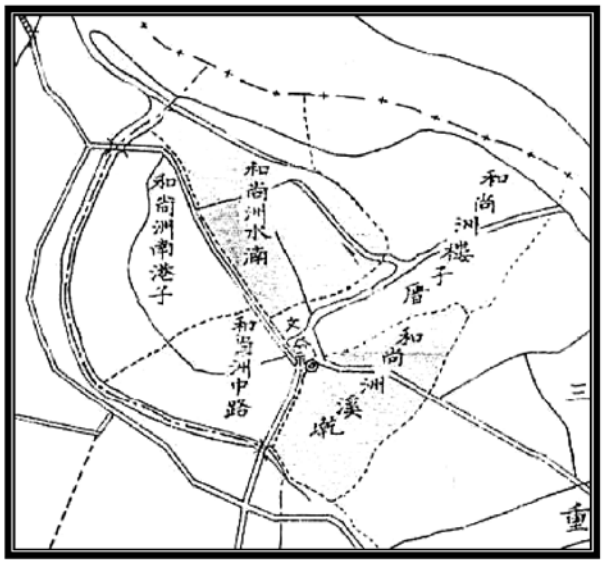

圖 2-1-15　鷺洲庄略圖大正 9 年（1920）（摘自《鷺洲庄要覽（昭和六年）》）

聚落角頭來，這也是蘆洲聚落起源的五個源頭。

一代又一代的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繁衍的後世子孫，各氏家族後人，薪火相傳辛勤耕作，蘆洲以及淡水河兩岸的開發和繁榮，灑下了永不停息的汗水。勇於開拓的同安移民及其後裔們，應該為他們不懈的努力所創造的繁盛成果而感到自豪。

乾隆年間的蘆洲地區，此之所以吸引大量同安籍人士，李氏以及陳氏家族大舉入墾，其之原因有 3：

第 1、蘆洲地區天然條件優良，移墾者在選擇初墾地時，「勢高而近溪潤淡水」者為最佳的墾地。蘆洲為水上沙洲四週環水，民生必需及開墾所需的淡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然經年水患不停仍吸引墾民前往。

第 2、蘆洲地區所處的環境不論是在氣候、緯度、地理環境等條件均與同安移民者的原鄉類似給予同安移民一種家的感覺，故吸引大量同安移民前來。

第 3、初墾階段，移民者除了需要適應環境外，不知何時發生的水患、饑饉、械鬥、疾病等的天災人禍，讓移民者會有依附親族、緊族而居或是以共同的祖籍及方言作為認同基礎。蘆洲時為河上沙洲，河水是為天然的屏障，同安人既已在此群居他族人士自不願前來，上述 3 大因素使得同安李姓及陳姓成為蘆洲的開發主力。[102]

然而漢人移居進入臺北盆地，不論是閩粵移民或是南部移民，在陸運不便的年代，欲前往臺北盆地，大多數移民都是採取水路進入。清治初期，因陸路交通的不便，以及盆底地區水道縱橫、橋梁未興的情形，臺北盆地的交通惟淡水河是賴，故移民與土地開拓，亦先從淡水河下游而進入盆地。[103]

他們首先搭乘海舟抵達淡水河口的八里坌港，再換乘河舟上溯，逆淡水河進入盆底平原。於乾隆 58 年（1793），從福建漳州渡臺的移民陳樵，就是利用水運輾轉到達臺北盆地的和尚洲地方，也就是今日的蘆洲地區。[104]

在以陳樵為開臺祖的《陳氏族譜》中，記載了這段艱辛的旅程：

> 原籍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清朝乾隆帝時代第九世祖名曰樵，字天春公，夫婦帶同四子直到廈門港下帆船，開向臺灣島淡水河港上陸起水，因路途遠涉，自帶銀錢有限，並貧苦無故，無奈將第四子祈繼公以作船租，擔保於船頭行，自上路直途到關渡口，橫渡至觀音山下名曰和尚洲

[102] 吳敏惠，《蘆洲的大神將》，頁 12。

[103] 陳正祥，《臺灣地誌（下）》（臺北：南天，1994.10），頁 1018。

[104]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90。

地方，開墾安住幾年，所賺銀錢向船頭行討回第四子祈繼公。因和尚洲地方地勢比較低下，每年港邊水漲之故，將該開墾墾契賣渡李姓……[105]

從上面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陳氏家族來臺安家落戶的過程為：先從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的廈門港搭帆船橫渡臺灣海峽，抵達淡水河口的八里坌港。

八里坌港的興起，始於康熙 23 年（1684）清朝官方派撥安平水師，於春秋兩季輪番在此碇泊守備。直到康熙 50 年（1711），據聞海盜鄭盡心潛伏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臺州魚山、以及臺灣淡水，為防海盜之侵擾，官方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並在大甲以北增設 7 塘以為防禦，八里坌為其中的一塘，雖其防區過大、兵力仍嫌薄弱，卻為清代經制兵駐防北臺之始。

自此之後，漢人開始有組織地以八里坌港為據點，溯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各地拓墾。其後官方基於八里坌為一形勢遼闊之海岸要口，為加強治安，進一步派駐，當時北臺灣層級最高的軍事單位淡水營坐鎮於此，此舉使得南部墾民因身家獲得保障，大量北上拓墾，加速了北臺的開墾進程。

雍正 9 年（1731），官方在淡水廳之下添設竹塹及八里坌兩巡檢，在八里坌成立巡檢署，這是當時北臺灣最高階的文官機構，八里坌因而成為北臺的行政中心，加上龜崙社阻隔進入臺北盆地的山道，以及陸路交通的不便，由八里坌沿水路進入臺北盆地，成為當時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因此又確立了八里坌交通重鎮的地位。

而乾隆 53 年（1788），八里坌以位居淡水河口及較早開港的優勢，被指定為海禁政策下的北部正口，允許與福州的五虎門合法對渡，到了乾隆 57 年（1792），官方更進一步核准八里坌與泉州蚶江對渡貿易，成為「大船巨舶，輻輳停泊」的北臺大港，自此開創了八里坌港最繁盛輝煌的歲月。

直到嘉慶以後，因港口淤積，其商業機能漸次被對岸的滬尾所取代，繁盛的八里坌街退化成為一個樸質的小村落。從上述八里坌港的歷史來看，於乾隆 58 年（1793）渡臺的陳氏家族所到達的「淡水河港」，應當就是八里坌港，此港也是眾

---

[105] 陳柳金，《陳氏族譜並渡臺史記》，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原藏刊本，國學文獻館微縮編號 1085301(2-1)，1961，〈序〉。轉引自陳亦榮，《清代臺灣漢人在臺灣地區遷徙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1991.05），頁 97。

[106] 林一宏，《八里坌全覽手冊》（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博物館，2001.12），頁 33。李進億，〈雍正朝北臺政策初探 (1723 － 1735)—以行政、開墾及理番為探討中心〉，《史匯》6（2002.08），頁 95-108。尹章義，〈臺北平原拓墾史研究 (1697-1772)〉，收於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1999.10），頁 44-58。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 112。

多墾民、商賈進入到北臺灣的第 1 站，並由此展開他們在北臺各地的生業活動。[106]

自乾隆 53 年（1788）八里坌港確立為官定正口之後，廈門－八里坌－新莊這條水運路線，就成為了北臺灣與中國大陸間人貨運輸的主要交通方式。[107] 陳氏先人並在此轉乘河船到關渡渡頭，再由右岸的關渡對渡至左岸的和尚洲，在此開墾定居數年，後因濱臨淡水河的和尚洲水患頻繁，只好轉賣墾業遷居他地，而陳家這條經由海路渡臺，再利用淡水河運進入臺北盆地的動線，正是當時入墾北臺移民最主要的交通模式。

臺灣西部沿海平原與臺北盆地，為臺灣泉州籍移民的兩個集中區域。而臺北盆地既然為泉州府籍漢人的主要移居區，[108] 而在臺北盆地的泉州人中，同安縣籍移民密佈於淡水河下游兩岸的盆底地帶，呈現了面狀分布的狀態，位於淡水河下游左岸的蘆洲地區，尤為這片同安人優勢地帶中的代表區塊。[109]

根據一份臺灣總督府於昭和元年（1926）12 月所作的全臺人口祖籍調查，當時的新莊郡鷺洲庄（包含今之蘆洲市及三重市）的兩萬零四百餘位居民當中，屬同安籍者有一萬九千九百餘人，占總人口數的 97.5%。[110]

雖然這份調查的時間，距離移民開始入墾蘆洲的年代已有 200 年之久，但以清治到日治這段時期，臺灣社會內部人口流動的緩慢興來講，仍足以反映清治時期蘆洲地區漢人祖籍的分布情形。[111]

根據李棟明的調查研究，民國 45 年（1956）蘆洲地區的李氏人口占全體的 44%，為蘆洲的第 1 大姓，而第 2 大姓的陳氏所占比率為 11.1%，僅為李氏人口的四分之一，其餘姓氏的比例皆甚微小。[112]

而表 2-1-2 展現了幾層意義。首先，同安籍移民進入蘆洲的時間集中在乾隆年間（1736-1795），至嘉慶年間（1796-1820）移民潮已逐漸趨緩，少數遲至道光年間（1821-1850）始遷入蘆洲。根據嘉慶年間的土地契字，除了李、陳、張、劉等姓之外，尚有楊、林、郭、黃、周等姓

---

[107]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頁 38-39。

[108] 參見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師大地理系，1987），頁 15。

[109]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12），頁 21。

[110] 陳漢光，〈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1（1972.01），頁 87、93。

[111]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頁 13。

[112] 李重耀，《臺閩地區三級古蹟臺北縣蘆洲李宅研究與修護計劃》（臺北縣：臺北縣政府，1978.08），頁 4。李棟明，〈臺灣李姓人口分佈之研究〉，《臺北文獻》37（1976.09），頁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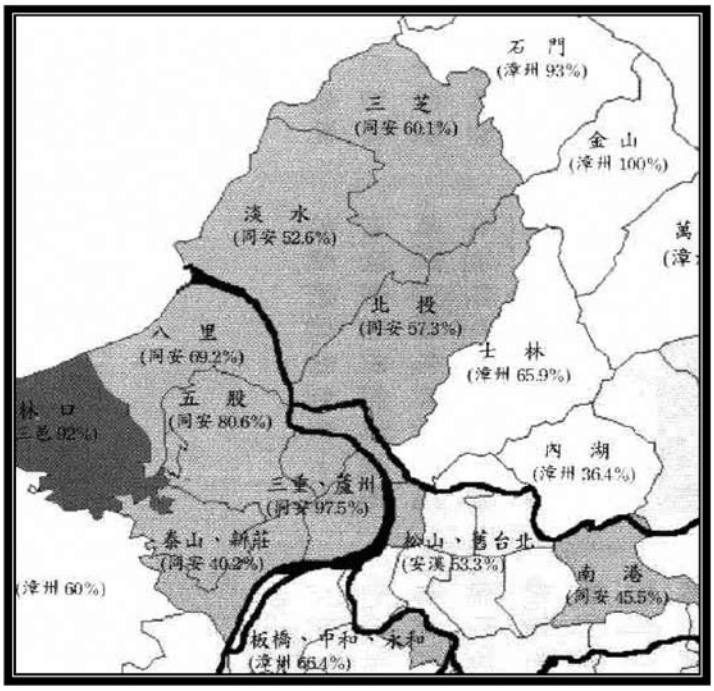

圖 2-1-16　昭和元年（1926）淡水河下游同安縣籍人口分布圖（摘自〈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

氏族人在蘆洲開墾，但其中仍以李、陳為蘆洲的前兩大姓，兩者的人口比例遠遠超過其餘姓氏，而這個姓氏的比率一直到戰後初期仍未出現多大的改變。

其次，移民的姓氏以李氏居多，其餘為陳氏、張氏及劉氏，而觀察入蘆李氏的原居地，以居於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者為多，其次為住在同安縣安仁里十六都蔡亭保西山下鄉前街的李氏移民。其中住在兌山鄉者的姓名中，可以發現大都具有伯、侯、公等字嵌於名中，而同安兌山的李氏自 15 世以來的字行（昭穆）即為「伯、侯、公、夫、士」，[113] 因此可以認定原居兌山的入蘆移民，就是兌山李氏家族的成員，譜系的世代為 15 至 17 世，彼此之間具有父子或伯姪的親戚關係。至於住在同安縣安仁里十六都蔡亭保西山下鄉前街的李氏移民，是為燕樓李氏的成員，入墾蘆洲的陳氏，則是原居同安縣安仁里十四都連厝保西亭大社的西亭陳氏家族，[114] 而張氏及劉氏的詳細原居地，並不明朗。

第 3，移墾初期的同安移民所選擇的開拓地點中，以水湳地區為主，其次依序為溪墘、南港子、中路，和樓子厝地區。[115]

由此觀之，清代入墾蘆洲的同安移民確實以血緣為其結合人群及聚落發展的重要原則，存在著扶老攜幼、聚族而居的傾向，這也可從蘆洲老一輩「蘆洲李，洲仔

[113] 同安縣仁德里兌山鄉李氏的昭穆（以仲字輩為第一世）為：「智仲子順，克光普慶，繹汝鴻可，初德叔伯，侯公夫士，孝友隆芳，文章永世，懿德常懷，家聲可繼。」參見李塗成，《（同安）兌山李氏族譜》，1971。

[114]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頁 40。

[115]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95。

表 2-1-2　同安籍各姓入墾蘆洲時間及地點表

入墾區域	入墾者	入墾年代	同安縣原籍地（堂號）
水湳庄（今水湳里、水河里、保新里及保佑里等地）	李伯捷、李伯東、李伯西及李杉侯等	乾隆初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綽	乾隆中期	同安縣安仁里十六都蔡亭保
	李仁侯	乾隆中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億侯、李續侯	乾隆末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陳東山	乾隆末期	同安縣安仁里十四都連厝保西亭大社（西亭陳氏）
	李日春	嘉慶年間	不明
	李伯明	乾隆中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樓仔厝庄（今樓厝里、復興里及保和里等地）	李公喜、李公籍	嘉慶年間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張溫	嘉慶年間	不明
中路庄（今中路里、中華里、中原里、光明里及九芎里等地）	李伯謨	乾隆初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劉振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不明
溪墘庄（今樹德里、溪漧里及仁復里等地）	李壽侯、李丰侯	乾隆中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飄夫、李寬夫、李立夫、李介夫、李儉夫、李坦夫、李條夫、李誦夫、李仁夫、李心夫、李德夫	嘉慶初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南港子庄（今正義里、永樂里、永康里及南港里等地）	李公正、李公秋、李公春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公贊、李公敏、李潘、李桃、李岩及李秋等	嘉慶年間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伯明	乾隆初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三重、蘆洲一帶（詳細地點不明）	李伯繼、李伯進、李平侯、李長侯	乾隆中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天侯、李物華、李公喜及李眼等	乾隆末期	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兌山李氏）
	李財源、李漳及李省等人	道光年間	不明

資料來源：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3-94。

尾陳」的口碑[116]或是蘆洲舊有的「李家庄」地名及「和尚洲與李」的俚語，[117]得知蘆洲聚落發展的濃厚血緣性，而這種同姓密集的聚落，在臺北地區並不多見。[118]

另一方面，蘆洲早期的移民大都為泉州府同安縣人，這可以歸因於蘆洲與同安相似的自然環境，復以他們來自於同一原鄉－同安縣，並說著相同腔調的語言—同安腔的河洛話，[119]源於這兩種同一祖籍地緣元素所產生的認同感吸引著同安移民，從而在蘆洲形成了 1 個有如原鄉翻版的同安人聚落。

例如與兌山李氏同為開墾蘆洲主力的西亭陳氏，也是來自於同安縣的 1 個宗族，[120]其開臺祖陳東山於乾隆末年入墾水湳地區，而其嫡系子孫陳用祥、陳用仲兄弟則是蘆洲地區最早的寺廟保佑宮的興建者，從〈保佑宮重建碑記〉中的信眾捐款名單看來，集資創建此廟者大多為陳姓，但其間仍雜有來自同安縣的林姓、柯姓、洪姓等零星捐款者，這可能與此廟的主祭神為池府王爺有關，池府王爺是同安人所共同信奉的家鄉守護神之一，同安各姓共同創建保佑宮的過程，正展現了蘆洲的同安移民對於祖籍地緣情感的重視。[121]因此，以祖籍與方言為認同基礎的地緣性，

[116] 洲仔尾位於五股地區與蘆洲水湳庄的交界處。詳見李豐楙主編，《蘆洲湧蓮寺丁丑年五朝慶成祈安福醮志》（臺北縣蘆洲市：湧蓮寺慶成祈安福醮委員會，1998.07），頁 9。

[117] 蘆洲保和宮編輯委員會，《蘆洲保和宮》（臺北縣蘆洲鄉：蘆洲保和宮管理委員會，1991.10），頁 32。

[118] 林衡道口述、楊鴻博整理，《鯤島探源—臺灣各鄉鎮區的歷史與民俗（1）》（臺北縣永和市：稻田，1996），頁 89。

[119] 語言學者張屏生認為，蘆洲人大都為同安人的後裔，導致蘆洲成為同安腔河洛話的分佈區域之一。參見張屏生，〈臺北縣蘆洲方言紀略〉，《北縣文化》50（1996.10），頁 10。

[120] 蘆洲市公所、成功國小合編，《千禧心 • 蘆洲情—鄉土文化專輯》（臺北：蘆洲市公所、成功國小，2000.12），頁 19。

[121] 參見〈保佑宮重建碑記〉，現藏於保佑宮之倉庫中，另可見於《蘆洲鄉志》，頁 329。保佑宮管理委員會編，《保佑宮說明書》，臺北縣蘆洲市：保佑宮管理委員會，出版年不詳，頁 1。

以及源於親屬與宗族關係的血緣性，同為導致同安人選擇蘆洲為移居地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同安移民自乾隆初期以來，大量來到蘆洲地區拓殖定居，經過了長期的經營後，到了同治 13 年（1874），和尚洲庄戶口的數量已有居民 42 戶、人口 178 人，其中包含了男丁 63 人、女口 56 人，以及幼孩 32 人、幼女 27 人，不論是人口數或戶數，均較鄰近的三重埔庄、關渡庄及八里坌庄為多，為興直堡九庄中人口規模最大者，代表同安人於蘆洲地區的開拓，已在清末呈現出一番繁榮興盛的景象。[122]

四、蘆洲各聚落的代表性家族

（一）中路張氏家族

（二）後壁厝林氏家族

（三）灰磁西亭陳家

各家族資料請詳見第八篇住民篇第一章「開墾姓氏源流」。

五、清中葉兌山李氏的拓墾與字契

占入墾蘆洲移民中之大宗者的兌山李氏族人，足跡遍佈全臺，但大多數族人集中於臺北的蘆洲及屏東的萬丹這兩個地方，其渡臺的總人數共有 490 人之多，乾隆年間就有 290 人渡臺，占 49.78%，為總數的一半；嘉慶年間有 105 人渡臺，占 22.8%；道光年間則有 90 人，占 15.2%；至咸豐同治之後，僅有少數個別移民渡臺。由此可知，李氏渡臺人口盛於乾隆年間，自嘉慶、道光之後逐漸沒落，這個趨勢與蘆洲地區兌山李氏遷入的年代相符。[123]

了解兌山李氏家族的拓墾，就如同了解蘆洲先民拓墾的經過，因為蘆洲兌山李氏家族，不僅人數眾多更是具有代表性。蘆洲的居民雖然以源自福建同安兌山的李氏族人多數，但是由於這些李氏族人出自兌山李氏家族的不同支房派別，他們遷移臺灣的時間也各自不同，因此在臺灣定居之後，就出現了許多以始遷祖核心的李姓同源而分支的家族。

在這些分支家族中，聚居于田仔尾（田野美）的李公正派下的李氏家族，是 1 個在蘆洲開發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新興家族。田野美李氏家族不僅同其他李氏家族以及陳、林、張、楊、鄭等家族一樣，蘆洲的開發和繁榮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我們對田野美李氏家族的拓墾發展歷史作一典型的分析，將有助於加深對於蘆洲移民

[122] 與蘆洲的和尚洲庄同屬淡水廳興直堡管轄的鄉庄有 9，其中的三重埔庄有 35 戶、123 人，關渡庄有 37 戶、98 人，八里坌庄則有 37 戶、135 人。參見〈同治十三年淡水廳戶口統計表〉，收於《淡新檔案》12403 案 49 之 18 號，現藏於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室，頁 104322-104323。

[123] 陳在正，《蘆洲李氏家族變遷史》（板橋市：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11），頁 15-17。

開發史的整體瞭解。

田野美李氏家族的始遷祖李公正，名正一，原是同安兌山李氏家族南尾井（又稱壟尾井）下厝二房的族人，系自兌山開基祖李仲文算起以下第 17 世。李公正出生於清代乾隆 32 年丁亥（1767 年）正月 11 日。兄弟多而土地少，生計維艱。乾隆 42 年丁酉（1777 年），李公正是年 11 歲，兄長公秋、公春決計隨族人東渡臺海，尋求新的發展。李公正雖年幼孱弱，然而志向遠大，家分憂，決心隨同兄長一道渡臺，開拓新的天地。

《增修兌山李氏蘆洲田野美支譜》稱：「同安及福建沿海各地，自宋明以來素以人多地少著稱，居民爲著生計的壓迫，視淵若陵，以海爲田，富有犯禁開拓的社會傳統。清代康熙、乾隆之際，是中國人口的發展高峰時期，福建沿海各地的人口壓力日益嚴重。是時臺灣已一統于清王朝，閩台二地的交往比較便利，沿海各地居民遂紛紛向臺灣移殖，開拓新區。而同安、廈門一帶，歷來是大陸通往臺灣的交通要津。居民移居臺灣的數量，更是居於各地移民數量之前列。兌山李氏族人於這一時期移台墾殖者亦爲不少。」[124] 李公正兄弟 3 人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遷移於臺灣的。

兄弟 3 人來到臺灣之後，在族人比較集中的臺北地區淡水河一帶暫居下來。兄弟 3 人胼手胝足，墾荒耕作，初步建立家業。當時的淡水河流域屬新開發地區，尚有不少荒地。在兄弟 3 人的辛勤勞動下，家境逐漸安定自足。長兄李公秋及其子孫們居住在十一份一帶，次兄李公春及其子孫們居住在中路一帶，而李公正則搬移到田仔尾（後改雅稱「田野美」），另立門戶。

道光中期，李公正兩個兒子開始小規模的購買土地。透過目前所能看到的李學道、李清水兄弟購買土地的較早的契約文書，就是這個時期的開發生活寫照。茲引二紙如下：[125]

（一）

仝立杜賣盡根絕契字人林讚永、鉗存兄弟等有承先父明買進李帶觀埔園二□□□□□帶旱田苧園等項，址在和尚洲下南港仔，東邊潭窟至車路，西連田至港，南至林待生園，北至□□西，四至明白爲界，年配納官租穀貳鬥五升。今因乏銀別創，告貸無門，讚兄弟等妥議願將此業□□□□□□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李學道、清水兄弟出首承買，三面議定依時盡賣出□價佛面銀玖拾大圓正。銀即

[124] 嚴秀峰主編：《增修兌山李氏蘆洲田野美支譜》，第四編《人物傳記》之一。

[125] 本文所引用的契約文書，除了特別註明之外，均中華私有古保存促進會嚴秀峰董事長提供，特此注明。

□□□收訖，隨將此埔園帶苧園等項□踏明界址，交付買主李學道、清水兄弟等前來起耕掌管永爲己業，□□□□寸土不留，日後讚兄弟等□□□□不敢言及找洗增添契尾滋事。保此業系讚兄弟承先父□□□□□侄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挂□□□□來歷不明爲礙，如有此情，讚兄弟仝花押諸人□□□不幹買主之事。此系二比甘願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杜賣盡根絕契字壹紙付執爲炤。

即日仝中□契內佛面銀玖拾大圓完足再炤。

再扣明其上□□上手交管字讚兄弟等□□有開□別業不□□□□□□應再炤。炤

爲中人　　□□□

在場知見人　□□□

道光貳陸年□□□　日　仝立杜賣盡根絕契字林讚永、鉗存

（二）

仝立杜賣盡根絕契字人楊頭、石、永、牙、寶兄弟等，有承先父遺下合仝內得應分旱田一所，坵數不計，自食塭壑泉水長流灌溉。址在和尚洲瓦厝前，東至陳家園、西至塭港，南至陳家田，北至楊家田，東西四至明白爲界，年配納隆恩租穀貳鬥正。今因乏銀別創，願將此田出賣，先問親疏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李學道、清水出首承買。當場議定盡賣出依時值價銀三佰三拾陸大圓正。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隨將此田踏明界址，交付與買主前去起耕掌管□□□納課永爲己業，不敢□□阻擋，一賣千休，割藤永斷，四至內並無留存寸土，日後頭兄弟及子孫等不敢言找言贖□□□□□滋事。保此田係頭兄弟等承父遺下合仝內應份物業，與親疏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挂他人財物交加來歷不明爲礙，如有此情，頭兄弟等出首一力抵擋，不幹買主之事。此系二比甘願，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仝立杜賣盡根絕契字一紙並繳上手契一紙、合約字一紙，共三紙付執爲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契內佛銀三佰三拾陸大圓足訖再炤。

再批明合仝系自己收留，有開載他所物業，不能粘帶□□聲明再炤。

爲中並代書楊明月

在場知見人母周氏

道光三拾年貳月　　日　仝立杜賣盡根絕契字人楊頭、石、永、牙、寶。

從這二紙契約中，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期李學道、李清水兄弟是同炊共食、家業合一的，所有向林、楊等人購置土地時，都是以兄弟二人的名譽進行交易的。咸豐初年，李學道本人亦故亡，年紀未滿50。由以上族譜史料我們可以得知，當時蘆洲地區可能因為地勢低平濕熱難耐，蠱毒瘴癘之氣蔓延，用現代術語來說，即是細菌孳生環境衛生欠佳，又欠缺醫療資源。因此，無論大人小孩常因疾病而病故。

20世紀後期，李公正長子李學道這一

支僅有兩戶人家。李公正遷臺以後的家族發展，就主要是次子李清水這一支了。雖然如此，李公正的兒子和孫子們，經過艱苦的努力創業，已經初步擁有這樣的田地規模，雖然還稱不上是小康之家，卻也足以自給自足並略有剩餘，從而這個家族在清代後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五節　清末至日治時期的發展

一、劉銘傳土地制度改革與蘆洲

（一）清代蘆洲官庄記載

清乾隆年間，自關渡宮和尚在和尚洲招佃農開闢，並設館徵收租穀。清乾隆間，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提到淡水廳內的官庄，都是在乾隆 22 年（1748）新設和尚洲與拳頭母山二官庄，年徵穀 3,772 石 8 斗 7 升 7 合。《淡水廳志》載和尚洲官庄，田每甲租穀 4 石，園 3 石，年共額徵穀約 1,405 石。[126] 這裡所提到的宮庄，就是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官方，其中和尚洲就是今日蘆洲市，拳頭母山，大致在今新店文山地區。

清朝雍、乾年間，蘆洲才剛開闊建莊，根據史載在乾隆年間，新竹城隍廟僧梅福，向淡水廳稟清開墾，獲准將此地產業充作關渡媽祖宮（今關渡宮）的香油。每年來水湳庄設宅徵收租穀。因此，關渡媽祖宮成為水湳庄的業主，當地的佃戶及農戶向關渡媽祖宮的和尚繳交大租、小租，彼此存在著三級租佃的關係，行之有年，甚至當地和尚洲公學校（今蘆洲國小）的設校經費，也是靠這些媽祖業田繳收的香油錢來支付。[127]

蘆洲地區除了水湳庄一帶為關渡媽祖宮的產業權外，另外蘆洲部分土地為官方的產權，這一方面在前面已提到。在清代官莊是田園充公歸官，徵收其稅租，不過因為資料不足尚無法瞭解蘆洲何以會成為官莊發的背景。只能從這些記載得知，清代蘆洲土地產權的概況，才能明瞭湧蓮寺碑示古碑文的歷史背景。

（二）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

清末臺灣在劉銘傳主政時期，因為推行新政支出大增，因此企圖整理財政以確定財源。劉銘傳因此陸續推動相關變革，如先辦保甲制度，再實施土地清理丈量，並在清丈事業完成後，在光緒 13 年（1887）著手賦稅改革，將現已清丈之田園，無論新、舊，悉照同安下沙成例分別土地等級，化甲為畝，刪去各項名目，合正耗、補水、平餘 3 者仿照「一條鞭」法，定其賦率，凡地丁、糧米、耗羨籌款一併在內，並化折徵穀的價格，做為土地

[126] 陳培桂，《淡水廳志》，〈賦役誌〉（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會編印），頁 91。
[127]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臺北：博揚文化，2000.12 月），頁 86-91。

賦稅。同時為了廢除大租戶制度，改以小租戶為業主，在民間引起許多爭議，不容易實行，因此改變一部分政策，把地租的負擔歸於小租戶，從淡水縣知縣汪興禕之請，自光緒 14 年（1888）起，改行「減四留六」辦法，把大租的四成留給小租戶作為地租，把六成繳給大租戶，另有官租也分成大租權與小租權，其內容與民租無異。[128]

由湧蓮寺出土的「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正是記錄臺灣巡撫劉銘傳，淡水縣知縣汪興禕在光緒 13、14 年實施「減四留六」仿「一條鞭」進行官庄改定折征賦的事蹟，此一碑記內容如下：

……補用府補清軍府特調淡水縣正堂、隨帶加五級、卓異候陞玉，為出示曉諭事。案奉本府憲雷，札開奉爵府憲劉批，據拳和官庄業主、佃戶、監生李朝立、生員劉廷玉、生員李樹華、生員陳廷堅、六品軍功劉國鈞、高□□□、劉雄藩、鄭元養、鄭旺、陳合記、林悅記等僉稟稱..「窃立等先人報升拳山保、和尚洲等處官庄租穀，向係按月租款，並未□年款年清。現在全台田園一律清丈，刪去各項名目，仿「一條鞭」改征正賦……獨於官庄一款，別出仍□□□胥差需索□□難堪，懇請改征折色，以免分擾而示體恤」等情。

奉批仰府飭縣索價折征示諭遵照等因轉府，示仰蒙批，查拳和官庄正耗租穀一款向征本色，今嚴飭改定折征，而每年穀價貴賤不同，自應酌中定價□□，以垂久遠而□□□。現經本縣酌定每石折征番一元四角三辦，正耗一切在內，不准胥役絲毫浮收……業經詳蒙憲示照辦在案，合行出示曉諭。

為示仰拳和官庄各業主、佃戶人等人知悉……爾等應自本年分起應完前項官庄外租穀，概照官定穀價，每石折完番銀一元四角三辦，正耗一切在內，務須各按實數折價清完，毋得絲毫拖欠；倘該胥役等敢于定價之外需索分文，許即指名稟究。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光緒拾肆年玖月初二日給，發貼曉諭。

湧蓮寺的「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其有幾項歷史的重要意義：

(1) 證明蘆洲、新店地區在清代是大臺北地區僅有的 2 處官庄的重要歷史文物，在清代大臺北地區開發過程中，大部分土地都是由民間墾首結合個農開墾而成，但在《淡水廳志》中記載，乾隆年間，拳山保今新店文山地區、和尚洲今蘆洲，成為大臺北地區 2 個僅有的官方土地，由官方將土地承租給當地業主個戶，

[128]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92。

再繳納租穀以稻糧代替稅金，雖然蘆洲部分土地的歷史過程並不十分明瞭，但從碑文中所載：拳山保、和尚洲為官庄，是說明蘆洲、新店地區有異於大臺北其他地區開發過程，是由官方主導的最有力說明。

(2) 對清代末期土地租稅的變革有重大參考價值：

湧蓮寺古碑文中所載之內容，主要是清光緒 14 年（1889），臺灣省臺北府淡水縣知縣汪興禕為配合巡撫劉銘傳，實施土地租稅變革，將臺灣省所有土地重新丈量造冊，廢止大小租之陋規，進行「減四留六」的租稅政策，但因臺灣南北開發時間不同，此一政策遭到南部民眾反對而功敗垂成。

而在淡水縣（今臺北市、臺北縣、部分桃園縣內）因有拳山保、和尚洲 2 地為官庄，不適用「減四留六」的租稅新制，所以特別將這 2 地的繳稅方式另外規定，才出現「全台田園一律清丈刪去各項名目仿一條鞭改征正賦獨於官庄一繳口出個戶…」的碑文告示，透過這一告示，希望這 2 地區的官庄業主個戶，能統一按照規定繳納租稅，如租穀執照官定報價，由以往以稻穀繳納改為折合銀元多少，因此這一告示碑示為官方公告之性質，對清光緒劉銘傳實施土地制度變革具有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

(3) 確立湧蓮寺在蘆洲地區開發過程中其官方和民間的重要地位：

「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古碑文，公告清光緒 14 年（1889）9 月，一般告示曉諭大多用紙張書寫公告在重要市集地區或官方據點，此一告示為公告新制租稅方式，希望相關業主個戶能知悉配合，所以選擇在當時蘆洲的湧蓮寺廟前豎立石碑，根據學者專家的調查，此一型式的碑文僅蘆洲才有，新店地區不曾發現這種古碑。「碑示」的公告時間，距湧蓮寺肇建不過僅有十餘年時間，在這時期湧蓮寺週遭顯已成為熱鬧市集，並得到官方和民間的共同認定，是本地重要的信仰、聚會及訊息交換的重要地方，才會在此豎立石碑，故湧蓮寺在整個蘆洲地區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時程上是非常快速。

短短十餘年，就已躍居成為蘆洲的地方重鎮，才有日明治 30 年（1897）設立和尚洲公學校的歷史演變。因此，湧蓮寺在蘆洲發展過程中，是具有民間信仰、社會、政治、經濟及文教的多種功能。另外在碑文中也提到生員李樹華，在蘆洲俗稱「李老師」，當時任職鳳山縣教論，為蘆洲的重要仕紳地主，是現在「蘆洲李氏古厝」的第 3 代傑出人才，可見該家族在蘆洲開發過程，也具有重要地位。

蘆洲湧蓮寺「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的偶然出土讓蘆洲土地變遷多一份歷史見證，也更彰顯湧蓮寺在整個蘆洲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古碑中的文字記載，讓我們重新體認劉銘傳在清代對土地制度改革的努力，不論成功與否，

都在歷史的洪流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這種歷史演變的軌跡正是這塊土地生生不息的動力。撫今追昔，古碑不僅是湧蓮寺的珍貴文物，也是印證蘆洲變遷的寶物，更是臺灣歷史變遷的重要見證。[129]

二、清末至日治初期的蘆洲

（一）聚落發展演變概況

時至光緒甲午年（1894）清廷割讓臺灣前夕，蘆洲名曰河上洲莊，隸屬芝蘭二堡。日人治臺初期大抵沿續清制，俗稱的十三庄首見於明治 36 年（1903）的《臺北廳誌》，當時本區屬臺北廳芝蘭二堡，包括店仔庄、十一份庄、樓仔厝庄、南港仔庄、中路庄、水湳庄、獅頭庄、車路庄、土地公厝庄、溪墘庄、和尚港庄、王爺宮庄及中洲埔庄等 13 個聚落。

各聚落的範圍分布狀況，首見於明治 37 年（1904）的臺灣堡圖，圖中詳細標明各墾庄及聚落的範圍、道路分布、寺廟位置、保甲局、庄役場等重要設施的位置，由圖可知全區分為 6 庄 13 聚落：中洲埔庄含中洲埔 1 個聚落，水湳庄包括和尚港、水湳、王爺宮、獅頭等 4 個聚落；樓仔厝庄包括樓仔厝、土地公厝及店仔口等 3 個聚落；溪墘包括十一份、溪墘及車路等 3 個聚落；中路庄包括中路 1 個聚落；南港仔庄則有南港仔 3 個聚落。此 6 庄 13 聚落亦成為蘆洲日後各種地方制度、宗教角頭的分界依據。[130]

清末漸成發展重心的店仔口，除地勢較高不至於時時遭受洪水為害，及其地處樓仔厝、溪墘、中路等 3 大庄頭的交會點等，先天地理條件因素外，最重要者莫過於日人領臺後，將各項現代化設施設置於此有關。主管三重、蘆洲行政事務的鷺洲庄役場、和尚洲公學校、圖書館、派出所及各種產業組合、社會團體、輕便車車站，日治時期均設置於此。[131]

清朝中末期後淡水河逐漸淤積、河運往來不再便利，日人治臺後大力發展陸運取代水運，交通早期仰仗河運興起的街市，如新庄、艋舺、大稻埕等地逐漸沒落。取而代之則是陸運輻奏地，地處通往新莊、八里坌、三重埔三條道路之交匯所在的店仔口也不例外，自日治起即成為蘆洲最具代表性的街市。

日人治臺初期，對於地方行政的區域及制度雖多所變革，蘆洲因與鄰近地區如：三重、五股等地，仍有十分明顯的圳溝做為分野，行政區域與清治時少有變動。較重大的變革為大正 9 年（1920），臺北州行政區域重劃後，將對岸的中洲埔

---

[129]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94-98。

[130] 吳敏惠，《蘆洲的大神將》，頁 13。

[131]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126-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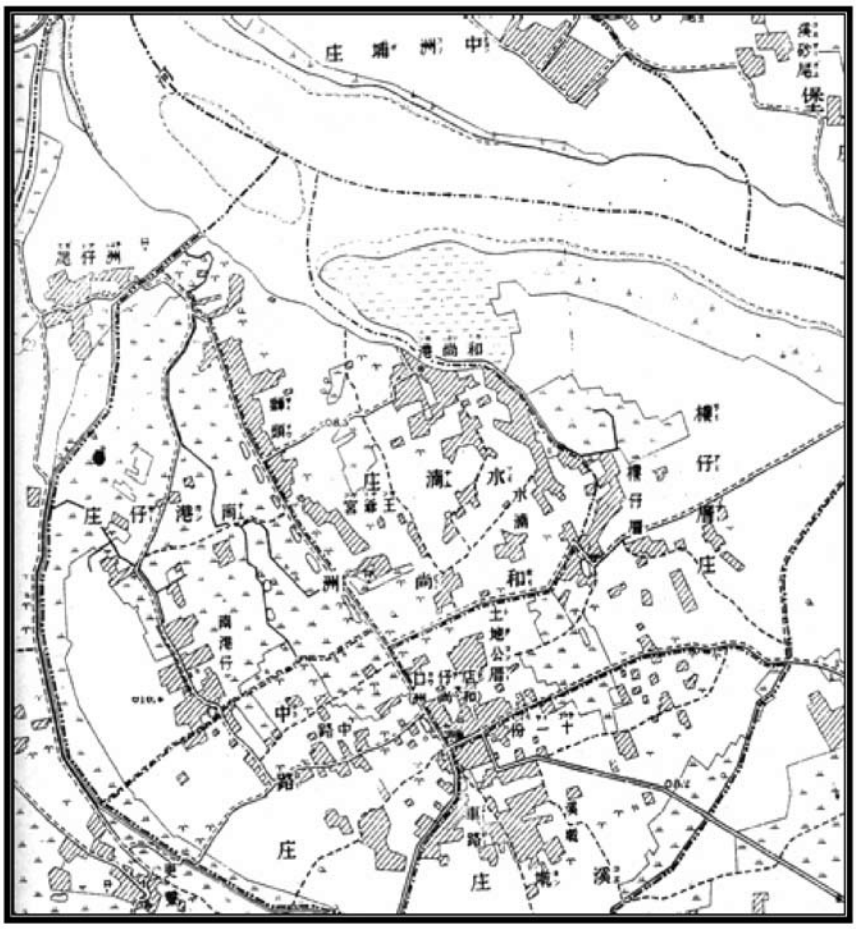

圖 2-1-17　明治 37 年（1904）蘆洲地區聚落分布圖（摘自《臺灣堡圖》）
圖註：區域內繪有斜線的圖示，代表聚落的建地。

劃歸士林街所管，此自中洲埔便與蘆洲分屬於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域，終至臺灣光復前，蘆洲全區隸屬於鷺洲庄包含溪墘、中路、南港仔、水滴、樓子厝等 5 個大字，下轄 13 保甲。[132]

（二）淡水河兩岸的生活圈

然而，蘆洲境內的河溝渠道與淡水河下游各港渡間，所共同構築的水運網絡，在清朝拓墾到日治中期這兩百多年的時間裡，為蘆洲、三重及對岸社子等同安人優勢分布區之間，在農商往來、寺廟分香交陪，以及共同生活圈的形成上，扮演一個溝通聯絡的媒介角色。透過水運的聯繫，淡水河兩岸的同安鄉親或同姓族人得以緊密交流，蘆洲與社子兩地因而形成一個生活圈。

在蘆洲人宗教信仰寺廟祭祀圈，與他廟互動交陪的範圍，以及輪祀角頭的分布，是經由地緣上同一祖籍地泉州同安縣，以及血緣上同源宗族關係的因故，長期互動連結而成的，而這種共同的宗教信仰，不但結合了蘆洲境內各個區域的人群，更擴展至淡水河下游，與各地區同安人的聚落分布所在互動。

尤其是蘆洲對岸的社子地區，兩地間透過對渡口水運的便利性，以及利用宗教

[132] 吳敏惠，《蘆洲的大神將》，頁 13。

信仰的互動融合，逐漸交互作用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漸漸形成 1 個在農墾、婚姻及行政等層面上共同的生活圈。位居淡水河兩岸的蘆洲與社子，從移墾初期至今，兩岸對渡之居民，極為密切的共同生活著，彼此之間姻親血親親上加親，而這份長久緊密的人際網絡關係，實有賴於宗教信仰，此種人群之神聖樞紐核心的維繫。

蘆洲清海宮的龍舟競渡活動，自清朝農業拓墾時期即開始舉辦，一直到日治及戰後初期仍年年舉行不輟。而水湳與對岸的社子中洲埔地區，一直聯合舉辦著這項活動，顯示出兩地之間，存在著由對渡口岸連結而成的共同信仰。

根據岡田謙於昭和年間的實地調查，蘆洲與社子兩地以水仙尊王為祭神的龍舟競渡活動，共分兩階段舉行：第 1 階段的時間訂在 5 月 5 日端午節，由蘆洲水湳及社子溪洲底、中洲埔這 3 個區域單位，各借船一艘舉行競渡，活動經費約 30、40 圓，以 3 地的田甲額與丁口數，由各住戶依比例繳納；至於第 2 階段則是在 5 月 7 日，設爐主 1 人，構築小屋奉祀水仙尊王神像，兩地住戶各供牲禮祭拜，另由和尚洲水湳借船 1 艘，中洲埔出船 1 艘，合為兩艘舉行競渡。[133]

但後來由於臺北盆地水運交通的沒落、水湳溝的淤塞，蘆洲的水運時代與淡水河沿岸各地相同，沒落於日治中期，戰後正式告終。[134] 民國 70 年代築起的堤防，阻隔了河岸與陸地人群的親水動線，這項蘆洲與社子龍舟競渡的宗教活動，在戰後逐漸消失於淡水河的水域之上。

從以上的歷史發展可知，蘆洲與社子這兩塊隔河相望的沙洲埔地，共同擁有臨近河濱的地理位置及洪水頻發的水文環境，與水關係極深，加上兩地居民大多為同安移民，部分人群還系出同一宗族，彼此之間的對渡往來本就極為密切，[135] 再加上兩地均共同崇祀水仙尊王信仰，並結合每年例行的龍舟競渡活動，來加強兩地居民的交誼心與凝聚力。因此，一個由蘆洲與社子共同組成的生活圈，就在兩地頻繁動員而持續交誼的活動中逐漸成形。

蘆洲社子兩地親如一家的文化特徵，除了共同的水神信仰之外，更表現於通婚網絡、行政區劃，以及寺廟輪祀角頭的互動上，並可由這些要素所在位置，構成的面狀分布，呈現出「蘆洲－社子生活圈」的區域範圍。

---

[133] 岡田謙著、陳乃蘗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9：4（1960.12），頁 19、24。

[134] 林興仁主修、盛清沂總纂，《臺北縣志》，頁 4674-4767。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頁 128-135。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頁 36、41、67、98。

[135]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頁 3。

咸豐 10 年（1860）的大規模漳泉械鬥，是為臺北盆地族群紛爭事件中的最後一次。此後族群意識不再構成嚴重的社會分歧，但仍在不同祖籍人群的心中種下芥蒂，這種導因於族群械鬥的偏見，最終還是影響到彼此間的交誼活動與通婚行為。[136] 因此直到 1930 年代，被泉州同安人驅逐至士林的漳州人，依舊只願與同祖籍者通婚，而不和僅隔基隆河相鄰的社子人結親，原因就出在社子人都是祖籍同安的泉州人；相對的，同安籍的社子人，也大多與同祖籍的中洲埔人、蘆洲人及五股人通婚，不肯與對岸的漳州家族結親家。[137] 因此，蘆洲與社子兩地構成 1 個通婚網絡，兩岸人民長期以來互結姻親的結果，在同祖籍的鄉誼之上再多 1 層聯姻而成的戚誼，這種親上加親的關係，讓兩地人民更為緊密的聯結在一起。

事實上，除了鄉誼與戚誼，蘆洲人與社子人之間人際關係的維繫，主要仍是以同族的血親關係為基礎，於其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社子島上有好幾個的大家族，皆是由蘆洲遷徙過來開墾落戶，如中洲埔地區的一戶李姓大家族，在族譜中就明確記載著他們的祖先是蘆洲兌山李氏的一支，於清代遷移至社子島拓墾農地，而在鄰近中洲埔的浮洲仔地區有一王氏家族，其開臺祖亦非直接到浮洲仔開墾，而是先到蘆洲、三重埔一帶落腳，後來才渡河至現居地拓墾定居，繁衍子孫。[138]

從這個角度觀察，社子人可以說是蘆洲人的同親族裔。而當一個宗族分居淡水河兩岸之後，在對渡水運便利的聯繫之下，同族間的來往仍然密切，再加上同安祖籍這個地緣關係的連結，蘆洲境內的寺廟，不論宗族的宗廟、祖公會或是祭拜祖籍地鄉土神的廟宇，其輪祭角頭的位置，大多能跨河延伸至社子地區，透過共同的宗教信仰來聯絡情感、凝聚人群，而這正是「蘆洲－社子生活圈」得以形成、運作及維繫的重要機制。[139]

在蘆洲境內 3 大寺廟－保佑宮、保和宮及湧蓮寺的建廟源流，及其輪祭角頭的分布狀況，從中可以見到地緣及血緣因素對於角頭分布的影響。此外，蘆洲地區尚有一種並未建廟，但以祖公會形式來聯繫宗親的宗教信仰，如燕樓李氏族內就存在著由五角頭輪祭中壇元帥的祖公會，[140] 而

---

[136] 許達然，〈械鬥與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 期（1996.07），頁 49。

[137] 岡田謙，〈村落家族—臺灣北部村落生活〉，《社會學》5：1（1938.12），頁 51-53。西岡英夫原著、杜武志譯，〈浮洲部落「社子」－鄰近島都的特殊村落之鄉土觀察記〉，頁 255-257。

[138] 王志文主編，《滄海桑田話社子》，頁 55。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頁 53。王志文，〈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頁 37。

[139]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155。

從這類寺廟和祖公會中角頭分布的位置，即可約略界定出蘆洲社子生活圈的區域範圍。

首先，從兌山李氏的宗廟保和宮 7 個角頭中，可以發現社子中洲埔地區是附屬於水湳角之中，兩地共同構成 1 個輪祭單位，[141] 而不屬於同處社子島上的崙仔頂角（今士林區永倫里一帶，舊名三角埔、崙仔頂），此因中洲埔與水湳兩地為對渡口岸，彼此來往密切，多為同一家族分居兩岸，親密凝聚的兩地居民自然可以共組一個角頭－水湳角，當輪到水湳角主持保生大帝祭典時，再從自家中選出爐主，協力籌劃祭祀事宜。此外，基隆河呈網狀流路匯入淡水河，河流切割阻隔了社子島的東西兩部，即使是易於橫越淡水河的渡船，也難以通過此種沙洲橫亙的網流，造成中洲埔與崙仔頂兩地雖同位於社子島，但彼此間的互動並不密切，反而分別與對岸的渡口過從甚密。[142]

社子島地形上的破碎割裂，以及蘆洲、社子間水運的便利，造就由對渡口岸與輪祭角頭共同串聯起來的生活圈型態，除了上述中洲埔、水湳共組一角的例子，蘆洲湧蓮寺及三重埔先嗇宮的信徒範圍，也跨河擴展對岸的社子地區，如社子島東部的溪洲底地區，與對渡口三重埔同為先嗇宮神農大帝的信徒，每到農曆 4 月 26 日的神農大帝誕辰，溪洲底的居民就會乘渡船到三重埔參與大拜拜活動，[143] 而中洲埔地區的居民則是以蘆洲的地方公廟湧蓮寺為信仰中心，其每年例行的大拜拜活動與湧蓮寺相同，皆訂於釋迦成佛前夕的 9 月 18 日。[144] 因此，溪洲底和中洲埔的居民，各自成為對渡口岸重要寺廟的信徒，以水運橫渡路線來劃分寺廟信仰範圍的現象十分明顯。

三、蘆洲跨河的拓墾

（一）兩岸行政區劃的演變

觀察蘆洲與社子兩地，於日治時期行政區劃的演變，也是為探討兩地關係的重要表徵。日治初期，由於臺灣總督府對於殖民地統治的經驗不足，且抗日活動風起雲湧，民間治安不靖，導致地方行政制度混亂而多變，自領臺的明治 28 年（1895）於臺北設置臺北縣之後，直到大

---

[140]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裔人祖公會角頭分布意義－以北投、社子、蘆洲之燕樓李家為例〉，頁 295-300。

[141] 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05），頁 134。

[142] 王志文，〈淡水河岸同安人祖公會角頭空間分布－以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頁 62。王志文，〈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頁 35。

[143] 楊蓮福等編，《三重埔風情畫》（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埔文史學會，2003.01），頁 39。

[144] 王志文，〈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頁 38。

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的 25 年間，臺北地區的行政區劃歷經 8 次變革。[145]

其間，從明治 30 年（1897）的士林辨務署，31 年（1898）的臺北辨務署，34 年（1901）的士林支廳，蘆洲與社子一直被劃歸於共同的次級行政區之下，[146] 直到大正 9（1920）年之後，社子被劃為士林街的轄區，蘆洲與三重埔合為鷺洲庄，兩地的行政隸屬始正式脫勾，此後就一直分屬於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域。

蘆洲與三重之關係，一向不若與社子那般緊密。光緒元年（1875），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隸屬於興直堡的三重埔庄，而蘆洲與社子的中洲埔則是芝蘭二堡的轄下。日治初期，蘆洲與社子同隸於士林辨務署，此時二重埔與三重埔是在新莊辨務署的轄下，顯示三重與新莊的關係較為密切；直到明治 34 年（1901），蘆洲、社子與三重始同歸於士林支廳的管轄，而到了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以淡水河為界來劃分新莊郡與七星郡的行政轄區，蘆洲與社子因而首度被分割成兩個行政區－社子被併入七星郡士林街，而蘆洲則與三重合併為新莊郡鷺洲庄。[147]

再從更下一級的行政區劃來看，與社子島上的其他區域相較，蘆洲與中洲埔的行政隸屬關係更形密切。在大正 9 年（1920）之前，士林支廳下轄 4 個區，每區設置區長 1 名管理區內行政事務，這 4 個區為士林區、社仔區、北投區及和尚洲區，分別統轄境內數目不等的大字（大地區之俗稱）。

值得注意的是，和尚洲區下轄 6 個大字－和尚洲樓仔厝庄、和尚洲水湳庄、和尚洲中路庄、和尚洲南港仔庄、和尚洲溪墘庄，以及和尚洲中洲埔庄。其中，社子島上只有中洲埔隔河為對岸的和尚洲區所管理，而不隸於統有社子島上社仔、溪洲底兩庄的社仔區。

換句話說，如果中洲埔的居民要到區役所辦理事務，他們必須乘渡船前往位於對岸溪墘地區的和尚洲區役場，而不去位於後港墘、離中洲埔僅咫尺之遙的社仔區役所。[148] 由此觀之，距離的遠近並非日治政府劃分行政區的唯一考量。

戰後，蘆洲本與三重埔同屬鷺洲鄉管轄，但此時三重埔人口已達三萬餘人，而蘆洲只有一萬多人，因此三重的士紳提議三蘆分治，並為三重獨立設鎮之事極力奔

---

[145] 林衡道主編，《臺灣史》（臺北市：眾文，1996.10），頁 504-507。

[146] 臺北廳編，《臺北廳誌》（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09），頁 80-84。

[147] 新莊郡鷺洲庄役場，《鷺洲庄要覽 (昭和六年)》，頁 1。臺北廳總務課，《臺北廳志》（臺北：臺北廳，1903.04），頁 6-7。三重市志編纂委員會，《三重市志》，頁 41。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蘆洲鄉志》，頁 14。

[148] 臺北廳編，《臺北廳誌》，頁 84-88。

走，其後兩地仕紳及官員決定以寺廟的信徒範圍來定界，也就是將信奉湧蓮寺觀音佛祖的和尚洲地區劃為蘆洲鄉，並以信仰先嗇宮神農大帝的二、三重埔歸三重鎮管轄，此案經蘆洲鄉代表會通過，報請臺北縣政府核准，於民國 36 年（1947）4 月 1 日正式成案，自此展開了蘆洲地區長達 50 年之久的「鄉」治時期。[149]

而在蘆洲設鄉的同時，社子島的仕紳正在積極向臺北縣政府及陽明山管理局陳情，尋求將社子獨立出來設為「淡江鄉」的機會，但此案並未通過，社子仍隸屬於士林鎮，[150] 至今依然是臺北市士林區的轄區。[151] 儘管與士林不屬同一生活圈，社子仍被強制劃歸其下，如採取寺廟的信徒範圍作為界定行政區域的原則，以蘆洲與社子如此緊密的關係，將生活圈與行政區的範圍疊合，或許不會發生社子仕紳陳情設鄉之事。

（二）「七十股公產」到「李復發號」

對於臺北地區行政區劃的設計，臺灣總督府參酌了清治以來由民間自發而成的自然村界，以及鄉治組織中的總理地保制度，於是在每幾個街庄設置街庄事務經辦處，辦理官命傳達、法令通告及調查戶口等事務，這就是大正 9 年（1920）前區長制度的濫觴。[152]

因此，中隔淡水河的蘆洲與中洲埔兩地，透過對渡水運的聯繫以及同族同鄉的關係，兩岸居民不論在宗教的信仰或是婚姻的締結上，往來均極為密切，雖有大河的橫阻，但經過長期的溝通凝聚，兩地已宛如一地，這應該就是日治中期以前，距離遙遠的蘆洲及中洲埔，得以共同構成一個行政區的主因。[153]

除此之外，社子延平北路九段的「中洲埔」，在清代是由蘆洲水湳角兌山李氏家族，集體開墾的「七十股公產」，清代

---

[149] 蘆洲於民國 86 年（1997）10 月 6 日升格為縣轄市，之前 50 年的行政層級均為「鄉」。參見陳萬富口敘編輯，《蘆洲泛月鷺江情—陳萬富回憶錄》，臺北縣蘆洲市：觀音山出版社，1999.03，頁 116-117。中央社記者黃旭昇台北縣 24 日電，〈台北縣蘆洲市結合湧蓮寺舉辦觀音文化節〉，民國 91 年 10 月 24 日新浪網各報新聞。蘆洲市公所、成功國小合編，《千禧心 • 蘆洲情—鄉土文化專輯》，頁 15。

[150]「民國四十年九月十日士林鎮社子居民，請設淡江鄉」條，收於臺北縣政府編，《臺北縣新聞史料彙抄》，手抄影印本，抄錄大正九年至民國四十年有關臺北地區之新聞報刊資料，共分三十三冊，現藏於臺北縣立文化中心，第三十三冊，頁 59-60、173-174。

[151] 王志文，〈社子島人文聚落之變遷〉，頁 6-7。

[152] 臺北廳編，《臺北廳誌》，頁 89。

[153] 李進億，〈蘆洲：一個環境史的探討（1731-2001）〉，頁 159。

臺灣布政司發給之丈單記載「七十股公產」字樣：道光 26 年（1846）給墾、光緒 6 年（1880）給照、光緒 14 年（1888）8 月發給丈單。並且在上面還註明：「議此中洲埔園業不許賣出他姓違者公誅將業充公批照」，充分表現出土地為家族所共同開發持有，唯恐子孫不肖敗賣家產，使後文所提的特殊土地運作方式，無法維持運作。害怕因外姓他族介入其中不配合，使七十股之「命運共同體」瓦解。[154] 換言之，中洲埔根本是水滴角的延伸。

明治 28 年（清光緒 21 年，1895）日本占據臺灣，為課徵土地稅，於明治 31 年（1898）訂頒「臺灣土地調查規則」，開辦土地調查，編定土地台帳以為當時扣稅之依據。至此原先統合一體之七十股公產土地，遂以「李復發號」為名義正式登記，開始有「李復發號」名詞之出現，在進入現代化國家管理體制之下，清代的「七十股公產」，轉變為日治的「李復發號」，成為一個具有法人性質的土地組織。[155]

隨著時代的演變，生活型態也漸漸變化，整個臺灣社會的改變也影響到中洲埔，因為「中國海專」（今臺北海洋學院）的設立，選中兩河交匯的中洲埔，而校區所在地，又位於 10 年鬮分一次的「上、下帖」地區，為顧及全體成員的權利公平分配，同時鑑於派下生活所需，於民國 55 年（1966）7 月，李復發號全體管理人就部分土地分別辦理標示分割，及名義變更登記予全體派下所有，其餘土地仍維持「李復發號」名義登記。經過民國 55 年（1966）7 月 28 日以李復發號管理人李坤地、張章、陳川澤、王玉崑、李榮華、李老謙、蔡芋蛋名義，辦理標示分割及名義變更，登記予李雲淡等百餘名派下所共有，並於同年 8 月 1 日登記完竣。[156]

至此歷經百餘年的七十股公產特殊分配管理模式，終於在時代的變遷中，劃下休止符，雖然「李復發號」名稱依舊存在，在陸上與河底也尚有一些公產，但是其顧及人人有地可耕起見，不能分割土地精神已不復存在。「流失土地互補」、「10 年抽鬮輪作」，那種福禍共享平分地利，戰勝洪水與惡劣環境的命運共同體，也徒留在中洲埔耆老的回憶中。

由清代的「七十股公產」，到日治時期的「李復發號」，蘆洲兌山李氏在淡水河的對岸，社子中洲埔地區，創造出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

---

[154] 王志文，〈兩河環抱共福禍－社子中洲埔「李復發號」之七十股公產〉，《臺北文獻》直字 148（2004.6），頁 306、317。

[155] 王志文，〈兩河環抱共福禍－社子中洲埔「李復發號」之七十股公產〉，頁 318。

[156] 王志文，〈兩河環抱共福禍－社子中洲埔「李復發號」之七十股公產〉，頁 328。

命運共同體家族。在眾志成城的意志下，不懼洪水威脅，不怕環境險惡，李氏先民以生活的智慧與細心的思維，在惡劣多變的沙洲浮汕地，分散風險平均生產。

一般土地開發完成後，即切割數份抓鬮抽籤，了不起以「品搭」，即「下品」配「上品」，儘量達到價值的平衡，即算十分細心，日後發展則為各自發展不得有異言。要是像「李復發號」這樣，則是將土地分成上、中、下 3 種區塊，各分 1 份；使派下子孫成員，同時擁有生活起居的「居住空間」；種植作物的「營養空間」；放養牲禽的「畜牧空間」。

在洪水肆虐地形多變情形下，顧及家家有屋可住，人人有地可耕，又有「失土互補」、「10 年鬮分」，保障日後子孫的基本生活，不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大家 10 年 1 次平均輪流交換土地，讓生產力較佳的土地，不為謀一家永久占有專利；也或許在如此艱困險惡的地理環境，為了能與大自然搏鬥，求得生存的機會，凝聚群眾的意志，激發人類的思考，想出如此週延的土地管理分配方式，適應這特殊的環境。

第二章
行政區劃沿革

第一節　行政區劃演變

一、蘆洲的行政區域演變

蘆洲地區自明鄭時期以來，便有漢人的足跡，據歷史的記載，蘆洲歷來的行政區劃如下，本地的行政變遷大致可分為以下時期：

（一）明鄭時期

明朝永曆 15 年（1661）至永曆 18 年（1664）臺灣北部起初隸屬天興縣，後來改制天興州。只是此時期蘆洲的開發，仍然只存在於一些鄉野傳說，並未有確切的史料證實。眾多傳說中，以九芎里的埋砲傳說流傳最廣最為生動：相傳是明末清初鄭成功部屬，因北征荷蘭人，路經此地遺有軍火一批，埋在地下，種九芎一株以做為日後識別，距今已有三百餘年，居民感念鄭成功恩德，遂將此樹奉為九芎公加以

膜拜。[157]

（二）清代時期

1. 康熙 23 年（1684）隸屬諸羅縣。

此時期清朝剛剛統治臺灣，臺北盆地尚未開發，是平埔族的世界，10 年後康熙 33 年（1694），臺北發生大地震，盆地部分地區陷落，其中包含蘆洲，沉入康熙臺北大湖底。

2. 雍正元（1723）年隸屬於淡水廳淡水堡，後隸於興直堡。

此時期初期蘆洲剛從康熙臺北大湖浮出，在乾隆 19 年（1754）又再地震 1 次，社子島陸沉蘆洲應該也陷落不少土地，所以地形尚未穩定，但是已經有至今仍在蘆洲繁衍的家族，其先人陸續進入開墾。蘆洲與新店拳山保並成為臺北盆地唯二的官庄，蘆洲地區至嘉慶年間，由於水利的興築土地開發進展更速，已形成 5 個漢人拓墾地區，後來形成 5 聚落：水湳仔、溪仔墘、樓仔厝、中路庄、南港仔，是今日蘆洲各聚落的濫觴，發展出日後大大小小之行政區。

3. 光緒元（1875）年改隸於淡水縣芝蘭二堡。

此時期之蘆洲，大致上已開墾完成，乾隆朝至光緒甲午前，蘆洲地形並無太大的改變，由同治 10 年（1871）所繪之淡水廳淡北地區圍圖，及光緒 13 年（1887）所繪之淡水縣圖，可知清朝統治的 200 年間，蘆洲在地名上雖有更迭但始終是個孤懸於淡水河上四面臨水的河上沙洲。只是因為隨著臺灣北部的開發，臺北地區行政區劃的升級，由原本淡水廳興直堡轉為淡水縣芝蘭二堡。

（三）日治時期

日本治臺初期，大都遵循清代的行政編制並未更改，到了統治穩定後，隨著地方的發展與都市計畫的推行，才開始行政編制的變革。

蘆洲俗稱的 13 庄，首見於明治 36 年（1903）的《臺北廳誌》，當時本區屬臺北廳芝蘭二堡，包括店仔庄、十一份庄、樓仔厝庄、南港仔庄、中路庄、水湳庄、獅頭庄、車路庄、土地公厝庄、溪墘庄、和尚港庄、王爺宮庄及中洲埔庄等 13 個聚落。

各聚落的範圍分布狀況首見於明治 37 年（1904）的「臺灣堡圖」，由圖可知全區分為 6 庄 13 聚落：中洲埔庄含中洲埔 1 個聚落，水湳庄包括和尚港、水湳、王爺宮、獅頭等 4 個聚落；樓仔厝庄包括樓仔厝、土地公厝及店仔口等 3 個聚落；溪墘包括十一份、溪墘及車路等 3 個聚落；中路庄包括中路 1 個聚落；南港仔庄則有南港仔 1 個聚落。此 6 庄 13 聚落亦成為蘆洲日後各種地方制度、宗教角頭的分界依

[157]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52。

據。[158]

日治時期蘆洲歷次行政變革如下：

1. 明治 28 年（1895）改隸臺北縣芝蘭二堡。
2. 明治 30 年（1897）隸屬於臺北縣士林辨務署。
3. 明治 31 年（1898）改隸於臺北辨務署。
4. 明治 34 年（1901）改隸於臺北廳士林支廳。
5. 明治 42 年（1909）支廳下署區署，屬和尚洲區。
6. 大正 9 年（1920）廢廳為州，改隸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此時蘆洲市在全臺行政區域重劃後，劃入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管轄，分為和尚洲溪墘、和尚洲中路、和尚洲南港子、和尚洲水湳、和尚洲樓子厝、二重埔、三重埔等 7 個大字。[159]

（四）民國時期

1. 民國 34 年（1945）隸屬於臺北縣新莊區鷺洲鄉。民國 34 年（1945），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接管臺灣政務，原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改稱臺北縣新莊區鷺洲鄉。

2. 民國 36 年（1947）劃三重埔地區為三重鎮，改名為蘆洲鄉。光復後原屬本區管轄的三重埔，因人口已達三萬餘人，而蘆洲只有一萬多人。三重地方人士提議三蘆分治，兩地仕紳及官員決定以寺廟的信徒範圍來定界，也就是將信仰湧蓮寺觀音佛祖的和尚洲地區劃為蘆洲鄉，在民國 36 年（1947）4 月 1 日，鄉內的二重埔、三重埔地區劃出另設三重鎮，鷺洲鄉一併更名為蘆洲鄉。

3. 民國 39 年（1950）撤廢新莊區署，改由臺北縣直轄。民國 39 年（1950），政府進行行政變革，撤銷新莊區署，蘆洲鄉公所由臺北縣政府直轄管理。[160]

4. 民國 86 年（1997）升格為市，定名為蘆洲市。民國 86（1997）年 10 月 6 日升格為縣轄市，全鄉 36 村轉為全市 36 里，至民國 87 年（1998）2 月再增為目前的 38 里。

---

[158] 吳敏惠，《蘆洲的大神將》，頁 13。

[159] 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蘆洲鄉志》，頁 11-14。

[160] 詳見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蘆洲鄉志》，頁 11-14。參見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頁 1。臺北縣蘆洲市公所編，《臺北縣蘆洲市統計要覽 (民國九十一年度)》（臺北縣蘆洲市：蘆洲市公所，2002），頁 1。

第二節　蘆洲市行政沿革變遷表

表 2-1-3　本市行政沿革變遷表

明鄭時期	◎永曆 15 年（1661）隸屬天興縣。
	◎永曆 18 年（1664）隸屬天興州。
清代時期	◎康熙 23 年（1684）隸屬諸羅縣。
	◎雍正元年（1723）最初隸屬淡水廳淡水堡，後來隸屬於興直堡。
	◎光緒元年（1875）隸屬淡水縣芝蘭二堡。
日治時期	◎明治 28 年（1895）隸屬臺北縣直轄芝蘭二堡。
	◎明治 30 年（1897）隸屬臺北縣士林辦務署。
	◎明治 34 年（1901）改縣為廳隸屬臺北廳士林支廳。
	◎明治 42（1909）支廳下署區署，隸屬和尚洲區。
	◎大正 9 年（1920）廢廳為州，隸臺北洲新庄郡鷺洲庄。
民國時期	◎民國 34 年（1945）隸屬臺北縣新庄區鷺洲鄉。
	◎民國 36 年（1947）劃本鄉三重埔區域，另立三重鎮，本鄉改名為蘆洲鄉。
	◎民國 39 年（1950）撤廢新莊區署，由臺北縣直轄。
	◎民國 86 年（1997）升格為蘆洲市。

資料來源：蘆洲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蘆洲鄉志》（臺北縣蘆洲鄉：蘆洲鄉公所，1996.10），頁 14。

第三章

各里沿革與地名探索

第一節　聚落發展與各里沿革

蘆洲自清季開闢以來，主要有 5 大聚落，即水湳庄、樓仔厝庄、溪墘庄、中路庄、南港仔庄，現在許多村里即由這五大庄分出。今日蘆洲市區之聚落繁茂，在民國 86 年（1997）10 月 6 日升格為縣轄市，全蘆洲鄉 36 村立即轉為全市 36 里，也都是由這 5 大聚落開始形成，而後開枝散葉擴散出去，依其開墾順序與舊地名分別為：

一、水湳庄

為今水湳里、水河里、保新里、保佑里、保新里、忠孝里、水湳庄等地，因位於淡水河之南岸沼澤沙地的地理景觀，故名為水湳，開闢者為陳用仲、李日春等人。[161]

水湳里，因水湳庄而沿襲舊名之。

水河里，位居淡水河邊，遂名水河里。始拓墾於雍正 7 年（1729），乾隆年間關渡僧梅福招佃開墾，因此又有和尚港之稱，原為水河村改制後為水河里。[162]

保佑里，因里中有古廟保佑宮奉池府王爺，古名為王爺宮口，後改為保佑里。

保新里、忠孝里，都是光復後由保佑里分出，取其新、吉祥雅麗命名之。

水湳村分割為水湳村、水河村、仁愛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仁愛村分割為仁愛村、忠孝村自民國 83 年（1994）4 月 1 日起實施；民國 86 年蘆洲鄉改制為蘆洲市後，均改村為里而為水湳里、水河里、仁愛里。[163]

二、溪墘庄

約當今溪墘里、樹德里、仁德里、仁義里、得仁里、恒德里、仁復里部分。溪墘之名由來為該地早期乃淡水河三重、五股、蘆洲間的一條圳溝所沖積之小土丘，因而名溪墘。

溪墘村分割為溪墘村、樹德村，自民

---

[161] 蘆洲市公所、成功國小合編，《千禧心 . 蘆洲情》，頁 21-22。

[162] 林秀英，〈蘆洲的寺廟與聚落〉，《臺灣文獻》，29 卷 1 期（1978:03），頁 176。

[163] 內政部網站，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___地名資料庫查詢及維護，http//placesearch.moi.gov.tw/change/。

[164] 內政部網站，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___地名資料庫查詢及維護，http//placesearch.moi.gov.tw/change/。

國 75 年（1986）4 月 20 日起實施，[164] 民國 86 年（1986）改制後為溪墘里、樹德里。

樹德里，清末時期本地產許多箐仔欉，乃染布之染料，該地居民建有箐仔邸，為染布坊，其音轉國語為樹德，故命為樹德里。

樹德村分割為樹德村、民和村，自民國 83 年（1994）4 月 1 日起實施，仁德、恒德等里之命名皆取其雅麗吉祥，並無特殊之涵意。

得勝村分割為得勝村、得仁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

仁復村分割為仁復村、仁德村、仁義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

三、南港仔庄

約當今正義里、南港里、永康里、永樂里、成功里、永德里，南港仔舊地名之由來有二說，一說是根據史載早期原住民平埔族中凱達格蘭之一支，南港社即居住本地，故名南港仔，但並未得到文獻證明，也無平埔族後裔之遺跡，值得繼續探索。另一說則是本地經年水濕，地勢低窪，位居淡水河之南的水邊濕地，故名湳港仔，後成為南港仔之名稱，至於其他里，則大都是新近分出之稱，大都取其雅麗吉祥之意，除了成功里因為成功國小和鄭成功有關係之外，餘皆無特殊之意義。正義村分割為正義村、永樂村、南港村、永康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

永樂里分割為永樂里、成功里，自民國 87 年（1998）2 月 9 日起實施。

四、樓仔厝庄

樓仔厝早期舊名「舊港嘴」，因位在淡水河的舊河頭上，因音之故，常被誤稱為「牛港嘴」；還有另一種轉音之說，起初名為「綠野厝」，訛稱為樓仔厝村，是嘉慶年間李姓所開闢。[165] 只是此說較少人提到與認同，只有出現在文獻當中。

而樓仔厝之命名，即有 3 種說法，最早說法是蘆洲李宅在清嘉慶年間闢建，因近水為防侵入，築屋較高，而有樓仔厝之說。

另一種說法即是當地有李姓大厝若干，其中 3 座門樓醒目，在傳統建築的村落之中特別引人注意，因此當地人們於是以門樓為地標，而成為地名，稱之為樓仔厝。

還有一種說法是在今仁愛街，以前有一棟 3 層樓高的西洋樓房，在過去的傳統建築聚落中，特別突出醒目令人印象深刻，因而稱此地為樓仔厝，綜合以上 3 種

---

[165] 林秀英，〈蘆洲的寺廟與聚落〉，頁 177。

[166]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16。

說法，應該以第 1 種說法較為有可能，[166] 但是在望文生義的情形下，另兩種說法在鄰里耆老之間，也頗為流傳。

樓仔厝庄約當今樓厝里、復興里、福安里、鷺江里、保和里、仁復里部分、得勝里部分、玉清里部分。樓厝村分割為樓厝村、信義村、玉清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167]

復興里，由樓仔厝里分出，取其復興中華之意。

鷺江里，因早期蘆洲稱鷺洲，又瀕淡水江畔，遂有鷺江之名，加上鷺江國小位居該里，稱鷺江里。樓厝村分割為樓厝村、鷺江村，自民國 75 年（1986）4 月 20 日起實施。

福安里，里內有一土地公廟，奉祀福德正神，祈求平安，遂稱福安里。鷺江村分割為鷺江村、福安村，自民國 83 年（1994）4 月 1 日起實施。

保和里，日大正元年（1912），蘆洲李氏宗親為奉祀守護神保生大帝，為求保佑和尚洲居民，遂名為保和宮，又因保和宮位居該里，故稱保和里。

玉清里，因里內有奉祀中壇元帥二太子哪吒之玉清宮，故命為玉清里。[168]

五、中路庄

約當今中路里、中華里、光華里、光明里、中原里、忠義里、長安里、九芎里、永安里、延平里。

中路庄之舊名由來有二說，一說是泉州同安人張溫至此開闢，在本地中央開路以利交通，使八里至新莊之路得以暢通，故名為中路，另一說則是張氏兄弟分家，以草結繩，一分為二，中間為界，即為中路。[169]

中原里，因里中有古厝「田仔尾李宅」，其建築風格乃循自中原古風，故有「中原厝」之稱，該里遂以中原里命名。

九芎里，里中有一株九芎樹，相傳是明末清初鄭成功部屬因北征荷蘭人，路經此地遺有軍火一批，埋在地下，種九芎一株以做為日後識別，距今已有三百餘年，居民感念鄭成功恩德，遂將此樹奉為九芎公加以膜拜，據說小孩如果得『猴損』，至此攜一紅布條，加以許願，不久就能治癒，故該里命為九芎里。另一里為延平里，也是和鄭成功有關命名。中路村分割為中路村、九芎村、中華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九芎村分割為九芎村、延平村、永安村，自民國 83

[167] 內政部網站，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地名資料庫查詢及維護，http//placesearch.moi.gov.tw/change/。

[168]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15-16。

[169]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18。

年（1994）4 月 1 日起實施。

忠義里，里內有忠義廟，奉祠池府王爺，原位於五股鄉洲後村，因興建二重疏洪道，乃遷移至此，該廟池府王爺係由保佑宮分靈，另一尊為廣澤尊王，則有兩百多年歷史，是當地陳氏家族守護神，忠義里之命名乃是因忠義廟的緣故。

中原村分割為中原村、光華村，自民國 75 年（1986）4 月 20 日起實施。

中原村分割為中原村、忠義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忠義村分割為忠義村、長安村，自民國 83 年（1994）4 月 1 日起實施。[170]

光華村分割為光華村、光明村，自民國 79 年（1990）4 月 1 日起實施。民國 86 年（1997）蘆洲鄉改制為蘆洲市後，均改村為里。

第二節　舊地名探索

一、「蘆洲」舊名的演變

（一）河上洲

蘆洲初名為河上洲，何時有此稱呼無法從文獻上考證得知，但從清季的一些文獻記載，時常出現「河上洲」之名稱，從地理景觀推測應是蘆洲早期形成時和三重為淡水河上的一大沙洲，被大漢溪及一些溝圳河川圍繞，先民至此遂以河上洲概稱而名之。

（二）和尚洲

和尚洲之名最早出現是在清乾隆年間，當時這片河上沙洲初期開闢時，由關渡宮廟僧梅福向官方申請開墾，獲准將此地產業充作關渡媽祖宮之香油錢，這些僧人時常至蘆洲，並設一公館即收租之房屋，徵收租穀，人稱「和尚厝」，另有「和尚港」之渡船頭，因其音與河，洲近似，故而形成和尚洲之地名。

（三）鷺洲

日大正 9 年（1920），日人重新調整行政區域，許多舊地名被簡化或改變，日人以和尚洲之名不雅，加上沙洲之地白鷺鷥甚多，於是簡稱為鷺洲，當時涵蓋範圍為今日的蘆洲市和三重市。[171]

（四）蘆洲

清咸豐、同治年間，淡北有八景其中一景為「蘆洲泛月」，在皎潔的月色下，蘆荻會發出亮光。許多文人墨客，常會在中秋節時在河上泛著小舟，依著美景時唱詩歌。當時渡船可至今日蘆洲國小處，沿

---

[170] 內政部網站，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地名資料庫查詢及維護，http//placesearch.moi.gov.tw/change/。

[171]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12-13。

淡水河至今日復興路、忠孝路，都為小圳可行舟，遂有蘆洲之地名，根據一份清代古文書執照，清光緒 10 年（1884）設省後應有蘆洲庄，但為時甚短，直至民國 36 年（1947）蘆洲和三重分治才又恢復為蘆洲鄉。[172]

（五）鹹草埔

清同治年間所出版之《淡水廳志》，其地圖上曾出現鹹草埔的一沙洲，當時應指蘆洲此一沙洲，因在水埔一帶曾栽植大量的鹹草，故鹹草埔可能也是蘆洲舊地名之一。在前文已經探討過，此地名也有可能是指今日的社子沙洲。

（六）中洲埔

蘆洲對岸為社子沙洲，在社子沙洲北邊，有一富洲里，其名稱是合併中洲里與富安里兩里後得名，在清代原名「中洲埔」也隸屬於和尚洲，約昔日中國海專附近。[173] 故一些舊地圖上畫淡水河之大沙洲，不以和尚洲稱之，而以中洲埔稱之，可見兩者也有相關聯，特別是與蘆洲水滿一帶。

二、蘆洲的小地名與土名

蘆洲舊地名除了這些大聚落的名稱外，尚有許多村莊的小地名或土名，這些小地名和先民開闢蘆洲這塊土地也息息相關，地名出現的時間年代不可考，通常是當地居民就地形、環境或生活空間、特徵，自然而然延用的地理名稱，這些地名通常不列入戶籍文獻中，僅是居民間口頭流傳的名稱，這些名稱計有：

（一）鴨母港

位於五股鄉更寮地區和蘆洲交界地帶，因早期有鴨農在此築寮飼養鴨群，塭仔圳流經此地，遂有鴨母港之稱呼，今在永安南路與環堤大道交會處，有鴨母港抽水站。

（二）大旗尾

位居光華路和永樂街交會口附近，因當時該地之地形，類似一支大旗之尾端，故名之。另一說為形似畚箕之尾，今當地有一土地公廟，名為箕穎宮，為當時重劃區興建時，從大旗尾搬遷至今地，可做為佐證。

（三）田仔中央

位在南港子重劃區的中心地帶，當時為一片平原農田，有幾戶林姓、葉姓居民築屋在此，為求辨識遂名為田仔中央，今蘆洲國中和李氏古厝一地即為田仔尾，為相對之地名稱呼。

---

[172]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13。

[173] 即今日「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之前身，已經遷校至淡水鎮的淡海新市區，現僅留一分部校區。

（四）灰磜

今中正路底一帶的農業區，相傳清末、日治初期本地有一窯廠，燒製石灰經淡水河銷往各地，故本地稱為灰磜。民國70年（1981）蘆洲所新闢灰磜重劃區，是為施工單位之誤用，當地實際名稱應為南港子與灰磜，二者隔三民路相鄰。

（五）新竹圍

和平路、中山二路交會地帶，因當地為新闢之地，以刺竹圍繞住宅邊故名新竹圍。

（六）七祖壇

位中山二路265巷附近內有一私廟顯應壇，供奉楊府將軍，俗稱七祖壇。

（七）得勝街

為紀念蘆洲泉州同安人，打敗來襲之新莊漳州人，取其旗開得勝之意。早期清代又稱為「筊店」口，後建湧蓮寺，又有佛祖宮或店仔口之稱呼。

（八）米市街

今正和街。日治時期當地有幾家米行，五股、八里、蘆洲之農民及其他居民，至此買賣米糧遂集結成米市，故有米市街之稱。

（九）九三

民國38年（1949），政府播遷來臺，大量軍隊進駐臺灣，在今信義路229巷附近，有空軍防砲部隊眷村群聚此地，當時有一軍中藝術工作隊「九三康樂隊」位在此地，鄧麗君幼時便在此被發崛培訓，當地民眾便以「九三」稱呼之。

（十）後壁厝

位在中正路476巷和仁愛街212巷之間，當地有百年古厝林姓大厝，位在大厝之後面位置的宅第聚落，便稱之為後壁厝。

（十一）豬哥巷

位在今仁愛街、中正路交叉口，三民路300巷附近，早期有1、2戶專門從事「牽豬哥」的種豬打種行業之居民在此居住，遂以豬哥巷稱呼命名。

（十二）大寮口

位在今三民路128巷至民族路口間。早期先民開墾時，在此地以茅草搭蓋一草寮，供後至的先民或羅漢腳單身漢居住，久而久之便成為一顯著目標，便以大寮口命名。

（十三）土地公厝

位於復興路和民權路交叉口附近，因當地有一土地公廟「福安宮」，此廟附近

的聚落，便稱之為土地公厝。

（十四）水滴溝（和尚港）

位在今蘆洲抽水站入口處之大排水溝，即昔日水滴溝，在清乾隆時，關渡宮僧人梅福獲准在水滴溝、水河境內溝邊建築 1 棟房屋，每年來此徵收租穀，稱為和尚厝。當時交通運輸靠水路，船隻及和尚自關渡來水滴溝邊靠岸出入，鄉里百姓稱之為和尚港，後來成為本地對外水路出入的主要門戶。

（十五）水滴埕、水滴埔

水滴地區為蘆洲市開發較早之地區，許多地名便以水滴為命名的主題，如位於今民族路 408 巷、422 巷、水滴社區活動中心，附近在早期就有一廣場做稻穀收割、曝曬之場所，因此稱為水滴埕，在水滴地區近淡水河，則有一荒地沙洲，則命名為水滴埔。

（十六）長堀

在今水滴地區，約今農業區內靠淡水河邊有一長溝，在早期曾有婢女不幸落水溺死，傳說死後出現捉替代者，叫做「掠交替」。因此當地入夜後十分恐佈，尤其夜黑風高荊竹迎風搖動，發出嘶叫聲音令人毛骨悚然，宛如婢女現身，所以當地人士便燒銀紙、供品祈求平安，也使長堀之名為外人知曉。[174]

（十七）王爺宮

即今日保佑里，在當地有 1 間供奉池府王爺的保佑宮，因此以神明保佑當地民眾之意而取其名。保佑宮附近也稱「王爺宮」。

---

[174] 楊蓮福，《戀戀蘆洲情》，頁 20-24。